学术专论

雍正教难期间驱逐传教士至广州事件始末考

汤开建

［摘要］本文主要利用中西文献档案资料，对雍正元年禁教以后西方传教士在全国的流动与分布、先驱逐到广州后又赶至澳门、广州男女八座天主教堂的源流、堂主、所属修会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证。考证的结果，对于认清雍正禁教后中国天主教传教的局势有极大帮助。

［关键词］雍正禁教　天主教　传教士　广州八堂　澳门
［中图分类号］K249.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4）－02－0001－33

雍正禁教是教史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但多数学者所关注的是雍正禁教的原因、过程、影响及苏努事件①，其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细节：禁教时将西教士驱赶到广州还是澳门，则多被人忽视，多数论著中均将这一问题一笔带过，罕有人对此展开深入研究②。笔者欲提出的问题是，在中国天主教史上，在广州大规模地集结西教士有两个时间，一次在康熙四年（1665）杨光先教案后，全国有 25 名传教士被驱赶到广州，居住时间长达 6 年③；第二次则是雍正禁教期间，全国约有 95 名传教士在广州地区集结，居住时间长达 10 年。笔者不知是否有人对这一细节做过这样的思考：在清中期的作为海防前线及国际贸易中心的广州城，先后约有 95 名西方传教士在此传教，并在城中建立起了 16 座教堂（实际数应多于此），奉教人数高达“数万”人。这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这也就是为什么雍正皇帝最初要将西教士全部驱逐到澳门而后来又同意他们暂

［收稿日期］2014－01－02
［作者简介］汤开建（1949—），男，澳门氹仔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澳门 999078；kjtang00853@sina.com

①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 4 章，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年，第 154—177 页；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光启出版社，1992 年，第 51—52 页；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第 3 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年，第 158—188 页；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4 年 3—4 月号；庄吉发：《清世宗禁教考》，载《大陆杂志》第 62 卷第 6 期，1981 年 6 月。

② Joseph Dehergne，La Chine du sud-est：Guangxi et Guangdong：Etude de Géographie Missionnaire，*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Vol. XLV*，1976，pp. 22—24，该文公布了几份耶稣会在广州建堂的档案数据，对当时的广州男女八堂进行了地理及所属修会考证，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广州教堂提供了极为可贵的第一手数据，但荣氏的考证尚存在一些问题，笔者于文中予以详辩；杨文信：《雍正年间天主教传教事业在岭南的发展与挫折——以 1732 年驱逐广州传教士往澳门之事件为中心》，载赵春晨等主编：《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657—677 页，该文利用荣振华的材料对广州教堂的地理分布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对本文启示甚多，但考证稍疏。

③《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 1 册，第 24 号《礼部尚书祁彻白等题拟将栗安当等 25 名传教士送回广东安插本》（康熙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55—58 页。赵殿红：《“康熙历狱”中被拘押传教士在广州的活动：1662—1671》，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论文，2002 年，第 48—51 页。

居广州但到雍正十年时再次下令将西教士驱逐到澳门的缘由，本文即对这一变化过程进行细致的求证。

一、雍正元年的禁教及将西教士驱逐至广州

雍正元年（1723）五月，在福建福安县爆发一场教案。萧若瑟《圣教史略》记录了这一教案的全过程：

> 福建自艾儒略等开教以来，教友素多，而福安县至雍正朝，则有广扬气象。教堂已建者十八座，教友以万计，西士梭巡，相属于道。雍正元年，福安知县以教士在某村又经营建堂，行将竣工，上疏于闽浙总督满宝，揭告其情。满宝系宗室贵胄，素知雍正极恶圣教，因迎合上意，一面出示，严禁所属境内建堂行教，其传教西士则一律驱逐出境；一面飞章上奏，求皇上禁绝天主教，大意谓，西洋人在各省传教立堂，人心渐被煽惑，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皆安插澳门，天主堂改为公廨，误入其教者，勒令改过自新。皇上将此折下礼部议奏。旋得礼部议，谓满宝所言极是，应按照所请实行。皇上遂批准，饬令各省督抚一律遵照，毋违。①

清文件的记录则有些不同，其过程也曲折许多。雍正元年五月，闽浙总督满保②发布告示：“今县内天主堂有十五六座，似此以外国之教惑人，风俗颓靡，莫此为甚，合行饬禁。”③ 随即又发布帖谕：“该县即将主教之西洋人查明确实姓名，有无内务印票，即使有票，亦不应在地方设教聚众，煽惑人民，立即详明，严押西洋人递解广东澳门查收安插。将生监为首者另详究处，以靖地方。”④ 七月，满保又联合福建巡抚黄国材用满文上密折于雍正帝：

> 查得福宁州所属福安县乃山中小县，靠近大海，具闻有西洋二人在彼居留传教，当即稽查得，入天主教之监生、生员有十余人，城乡男女入此教者有数百人，城内、大乡建有男女天主堂十五处，西洋二人隐居生员家中，不为人见，不惧知县禁令。每逢诵经礼拜之日，便聚数百之众传教，男女混杂一处，习俗极恶。奴才是以饬令文武官员，查出西洋二人，照例送往广东澳门。……将西洋人许其照旧在京居住外，其余各外省不许私留居住，或尽送京师，或遣送广东澳门，将各省所设天主堂尽行改换别用，不得再建。

满保的奏折进京后，受到雍正皇帝的高度重视，当即在奏折上朱批：“尔此奏甚是，极为可嘉，着照此办理。如此缮本具奏。”⑤ 上述奏折中提到的“西洋二人”指多明我会士罗巴拉斯和黄瑟伯神父。冯秉正 1724 年 10 月 26 日北京的信亦称：

> 点燃前面迫害之火的最初火花是去年七月在福建省福宁州福安县出现的，该地的基督教

---

① 萧若瑟：《圣教史略》卷 14，《近世纪》6，河北献县天主堂版，第 195—196 页。

② 满保虽然是雍正元年对福建基督教和传教士发动进攻的第一人，但有资料称，满保对杭州的传教士德玛诺十分友好，德玛诺曾经为总督画过一张沿海地区的地图，这样总督就没有干预杭州地区的教会事务。参见［捷］严嘉乐著，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1716—1735）》，大象出版社，2002 年，第 44 页。

③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1 号《福安县告示》（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0 页。雍正元年的福安教堂实际为：城乡教堂十八座，尚有未建成的新堂有上杭陈家圣堂一座，北门外西堂一座，北门外麻风院圣堂一座，县东门外麻风院圣堂一座，穆洋缪家大圣堂一座，缪家对门女堂一座，大留洋圣堂一座，廉村、桑洋圣堂各一座，罗家巷圣堂一座，甘棠圣堂一座，顶头圣堂一座。“以上各有会长管教，一堂或百十人，或两三百人不止”。参见同前书：之《福安县查明县内各处天主堂》，第 24 页；同前书之《福州府严禁福宁州及福安、宁德等县天主教事》，第 26 页。

④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1 号《总督谕帖》（雍正元年），第 19 页。

⑤《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 1 册，第 90 号《闽浙总督满保奏闻西洋人在福安县传教惑众送往澳门安插外省严禁西洋人居留传教折》，第 134—135 页。

徒由罗巴拉斯神父和黄瑟伯神父管理，他们是西班牙多明我会士，不久前刚从菲律宾到达那里。①

方济各会的档案也提到此事：

巡抚和总督便遍布命令，宣布天主教为邪教，将教堂改作书院，令入教者自行退出，违者处以一百杖刑和流放，带头建教堂之人，也将处以杖刑，其余人将被驱逐出境。两位多明我会神父被遣送至澳门。……黄瑟伯和罗巴拉斯神父于1718年10月到达澳门，然后伪装成水手，从澳门进入广州，他们曾一度致力于中文的学习。1723年初，当福建教难因他们而发生时，两人已经于两年内在福宁及其周围地区发展教徒248人。②

福安教案的爆发引起了清廷的重视，到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四日（1724年1月10日），管理礼部事务的多罗嘉郡王允祹③呈递礼部会奏，题请转饬全国地方官，严禁民人信奉天主教：

查西洋人留京者，有供修造历日及闲杂使用，至在外各省并无用处，愚夫愚妇听从其教，起盖天主堂，以诵经为名，会集男女，于地方毫无裨益。应如该督所请，除奉旨留京办事人员外，其散处直隶各省者，应通行各该督抚，转饬地方官查明，果系精通历数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余俱送至澳门安插，其从前曾经内务府给有印票者，尽行查出送部，转送内务府销毁；所有起盖之天主堂，皆令改为公所；凡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除，令其改易；如有仍前聚众诵经等项，从重治罪；地方官不实心禁饬，容隐不报者，该督抚查参，交与该部严加议处可也。④

据西文保存的档案，当时雍正皇帝的批复是：

照礼部决定办理。欧洲人是外国人，他们已在帝国各省滞留多年，现必须按福建总督建议办。但恐百姓对其有侮辱之举，因此朕命令各省总督巡抚给他们半年或数月时间把他们或送往朝廷或遣送澳门，派一名官员一路陪同照料他们，保证其不受侮辱。着谨遵此令。钦此。⑤

将传教士遣送到澳门的先例，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南京教案”时期。⑥ 后来由于礼仪之争，康熙四十七年（1708），清廷颁布“领票制度”，要求传教士领票，凡是拒绝领票的，一律发往澳门，遣送回国。⑦ 此后，朝廷传教士被接二连三遣送到澳门。不过也有例外，即康熙四年（1665），杨光先教案爆发后，朝廷将全国各省传教之西洋人栗安当等25人“送回广东”，但未驱逐至澳

---

① ［法］杜赫德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2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神父的信（1724年10月16日）》，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314页。

② *Sinica Franciscana* Vol. 10, pp. 751-752, p. 753, nota 23.

③ 允祹为康熙帝十二子，乾隆即位时晋封履亲王，据［法］杜赫德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2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神父的信（1724年10月16日）》，第324—325页称，允祹在雍正禁教初期原是准备对天主教士进行保护的，则允祹亦是同情天主教的清宗室人员之一。

④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第94号，《管理礼部事务多罗嘉郡王允祹题请转饬地方官严禁民人信奉天主教本》，第138页。

⑤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2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神父的信（1724年10月16日）》，第325页。

⑥ “南京教案”时期，北京的熊三拔与庞迪我神父及南京的杨玛诺、王丰肃、谢务禄均被驱逐到澳门。［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75、92、110、149页；徐昌治：《圣朝破邪集》卷1《南京都察院回咨》，香港建道神学院校注本，1996年，第90页。

⑦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第37号《总管内务府为知照颁给印票与否西洋人等名单事致礼部咨文》，第79—82页。当年被驱逐至澳门的即有：孟尼、董莫教、巴鲁茂、万多默、万济国、利明远、罗森多、单若兰、艾玉翰、单若古、赫宣、施提仁、劳宏纳等13人。

门。[①] 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此时清政府正在推行“迁海”政策，澳门亦在被迁之列，故此时不可能将传教士驱往澳门。所以，将在国内违规传教的传教士驱逐到澳门是明清政府长期实行的一项基本政策。雍正元年福安教案兴起时，闽浙总督满保于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所上奏折中仍称：“查出二名西洋人，照例送至广东澳门安插。”[②] 而当年十二月礼部的会奏亦是要将不留京的外国传教士送往澳门。

与康熙朝相比，雍正初年这次全国性的禁教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是对象的范围更广，其遣送的传教士包括了留京以外的所有传教士，哪怕是在各地原来持有印票的传教士，是以当冯秉正（Moyriac de Mailla）、戴进贤（Ignace Kögler）、巴多明等人将印票给同情天主教的十三亲王（和硕怡亲王允祥）看时，得到的答复竟是：“这种票在外省无任何作用，如果你们的事情平息下来，就要给你们换一种更适当的票。康熙朝颁发的印票已经不起作用了。”[③] 甚至有些地方干脆将康熙时期颁发的印票转送内务府销毁：“从前曾经内务府给有印票者尽行查出送部，转送内务府销毁。”[④]

二是遣送的地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遣送照例均是遣送澳门，但在传教士力争的情况下，雍正帝最后把遣送点定在了广州。由于将遣送的人物，包括京师以外各省的传教士，而原定遣送地点又是澳门，这就给在京传教士要求遣送广州提供了口实。时任清廷钦天监监正、又被称为“中国蒙难教会的中流砥柱之一”[⑤] 的德国耶稣会士戴进贤上疏言：

> 兹因福建之事，部议波及各省，一概驱往澳门，远臣奉命惟谨，敢不禀遵？惟是澳门非洋船常到之地，若得容往广东，或有情愿回国者，尚可觅便搭船。今俱不容托足，则无路可归。澳门虽住洋商，而各省远臣不同一国者甚多，难以倚靠，可怜欲往不能，欲归不得，此诚日暮途穷之苦也。近接广东来信，抚臣奉文之后，出示行牌，严加催逼，限六月内驱往澳门，不许迟过七月。因思，臣等荷蒙圣恩，留京备用，则每年家信往来，亦所不免，倘广东无人接应，将来何以资生。……惟望圣恩宽厚，俯赐矜全，行令广东免其驱逐，嗣后各省送往之西洋人愿赴澳门者，听往澳门；愿往广东者，容往广东。如此则臣等感激涕零，受恩靡尽矣。

雍正帝第一次接到戴进贤的奏章后，并未应其所请，还给他一个十分巧妙的回复：

> 朕自即位以来，诸政悉遵圣祖皇帝宪章旧典，与天下兴利除弊。今令尔等往住澳门一事，皆由福建省居住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众，朕因封疆大臣之请、廷议之奏施行。政者，公事也。朕岂可以私恩惠尔等，以废国家之舆论乎？今尔等既哀恳乞求，朕亦只可谕广东督抚暂不催逼，令地方大吏确议再定。[⑥]

雍正帝直接把球踢到了广东地方官员身上。西文档案记录稍有不同：

> 礼部就福建总督指控所作的决议规定，各省须清查持有先皇帝颁发的票的传教士，令其

---

①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 1 册，第 24 号《礼部尚书祁彻白等题将栗安当等 25 名传教士送回广东安插本》，第 59 页。

②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 1 册，第 92 号《闽浙总督满保题报各省居住西洋人或送京师或遣回澳门天主堂改作别用民人不得入教本》，第 136 页。

③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2 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某神父信（1724 年 10 月 16 日）》，第 328 页。

④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5 号《江苏巡抚何天培查禁天主教事》，第 30 页。

⑤ ［法］费赖之著，梅乘骐、梅乘骏译：《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62—1773）》，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 年，第 773 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 1 册，《西洋人戴进贤等奏请免令广东驱逐西洋人并各省送往之西洋人愿往广东居住折》（1724 年 7 月 1 日），中华书局，2003 年，第 58 页。

将票交出送还朝廷，予以作废等等。各省持有这种票的传教士不过三十人许，人们先前曾要他们答应永不返回欧洲，如今他们皆已年高体衰，怎堪经受如此艰难之旅？何况澳门非其祖国，可陛下要送他们去那里，我们深恐此消息一旦传到欧洲，人们会以为他们是因违反法律犯下大罪，所以才被逐出帝国以示惩戒的。①

应该说，戴进贤等人奏折所言，有一定的道理。据署广东总督鄂弥达雍正十年的一份奏折称：

从前洋艘原湾此地（澳门），缘康熙二十五年粤海关监督臣宜尔格图据……等因具题，经部覆准，故至今各洋船皆移泊黄埔地方。②

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毛克明还专门上了一份请求洋船“不必移泊澳门外洋之十字门以免贻误税课”的奏折，这份奏折有雍正朱批：“汝所陈不便，皆税务钱粮之不便，未念及地方永远之便与未便也。”③ 虽然朱批中明显可以看出雍正对毛克明所陈之不满，但是这也可证明朝廷与地方仍在为洋船停泊之事争论。

从法文档案中保存的戴进贤奏疏可以看出，当传教士们听说广州巡抚要将传教士遣送到澳门时，早已就此向怡亲王允祥提出：

从各省被逐的传教士大多不属于管辖澳门的那个国家，欧洲来华经商的船只在广州而不是在澳门靠岸，因此把愿意回国的人送往澳门实际上使他们反而无法成行。④

后巴多明、费隐（Xavier-Ehrenbert Fridelli）、冯秉正于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1724 年 7 月 1 日）再次进宫，向怡亲王递交陈情书：

礼部因福建省发生的事情判处将外省所有欧洲人遣送澳门，我们——您忠实的臣民——绝不会不遵奉陛下旨意，但我们恳请陛下详察，澳门不是来华船只通常靠岸之地，若准许传教士留在广州，愿意回国的人，就能找到可以让他们搭乘的船只。否则，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回国。澳门虽说是个商港，但散居各省的您的忠实臣民（指传教士）大多属于其他国家。他们的处境很值得怜悯，想留在中国却不被允许，要返回欧洲又没有办法，真像漆黑的夜间找不到任何栖身之处的旅人。据我们从广州得到的消息，巡抚命人公开张贴了礼部的决定。还发布严令让欧洲人必须于（阴历）六月、至迟七月离开其所有辖地。我们想到，陛下要我们留在朝廷效力，可我们不能没有欧洲朋友们的书信和帮助，若我们无人在广州受理，我们怎么能维持呢?⑤

由于传教士反复提出这样的请求，以及朝廷出于某些方面的考虑，雍正帝于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颁发谕旨：

令其暂止西洋人催逼往澳门居住，著督抚将军提督确议具奏，若与吏治民生无甚大害，可以容留。⑥

雍正帝的这一批示很快获得了广东地方官的响应。六月十七日（8 月 5 日），两广总督孔毓珣就

---

①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2 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神父的信（1724 年 10 月 16 日）》，第 329 页。

②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 1 册，第 127 号《署广东总督鄂弥达奏请外国船只仍照旧例在澳门海口拉青角地方湾泊折》（1732 年 10 月 21 日），第 174 页。

③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 1 册，第 130 号《广州左翼副都统毛克明奏请洋船不必移泊澳门外洋之十字门以免贻误税课折》（1733 年 5 月 11 日），第 177—179 页。

④ ［法］杜赫德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2 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某神父信（1724 年 10 月 16 日）》，第 334 页。

⑤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2 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神父的信（1724 年 10 月 16 日）》，第 336 页。

⑥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7 号《西洋人戴进贤奏恳容留西洋人留居广东并奉上谕》（1724 年 7 月 1 日），第 33 页。

西洋人留居广州天主堂之事上疏称：

> 臣等伏查，西洋人感慕圣朝德化，先后前来中国，就广东而论，未有生事犯法之处，于吏治民生无甚大害，亦无裨益。惟一旦尽送往澳门安插，该处滨海地窄，难以聚居，亦无各本国便船可以附搭，所以去住两难。广州省城则为每岁洋船聚泊之处，应将原住广东各堂之西洋人及各省送到之西洋人，视其年力壮健，及愿回西洋，遇有各本国洋船到日，令其陆续搭回。如果年老有病，及不愿回西洋者，听其在广州省城天主堂居住，不许复往各处行走。倘不守本分，或招致本地男妇行教诵经，治罪逐回。①

很明显，两广总督孔毓珣调查的结果是澳门难以安插全部的西教士，但可以让西教士暂时停留广州。十二月二十一日（1725 年 2 月 3 日），礼部正式批复：

> 应汝所请，将原住广东及各省送至广东之西洋人俱准其暂住省城天主堂。其愿回西洋者，听其搭船回国，年终造册报部。其不愿回国者，不许出外行走，如有不守本分，招致男女行教诵经，该地方官治罪逐回。②

于是，这一次禁教驱逐最后的结果即是将各地传教士遣送到广州。1724 年 8 月 20 日，巴多明神父的信称：

> 我们得知这些情况后，想做最后一次努力，请皇帝陛下赐恩，至少让传教士留在广州，不要强迫他们到澳门去。我们在一个奏章里陈述了我们的理由，通过皇帝的两个兄弟，第十三皇弟和第十六皇弟，我们的奏折几经周折于七月一日呈交给了皇帝，皇帝陛下作为答复，下旨给广州的官员，不要催欧洲人走，如果欧洲人留在广州有什么不妥，应尽快地呈报他。皇帝让四位帝国的大臣去传达这道旨令。③

1725 年 11 月 20 日严嘉乐写于北京的信称：

> 去年，基督教各教派的传教士都被逐出京城，为执行这一决定，皇帝给了半年的期限，当这一期限经过许多磨难期满以后，不管是用永无休止的送礼还是别的途径，都无法阻止许多省份的传教士被驱逐到广州。④

丹麦学者龙伯格（Knud Lundbaek）称：

> 最后，1724 年 7 月，皇帝陛下终于在最后一点上做了一些让步，命令广东的地方官允许传教士居留该地，只要他们不给公众制造麻烦。⑤

西教士很难全部安插澳门，而且澳门政府对非葡籍教士入居澳门亦持不欢迎态度，虽然这都是事实，但戴进贤等人要求西教士居留广州之更重要的目的是想保存广州这一重要的传教基地：

> 皇帝让我们留在这里为他服务，但若无人在广州维持我们与欧洲的联系，我们难以继续有效的工作。因此，我们恳请亲王求皇帝准许，或因年高，或因体衰而不愿返欧的人留在广州。我们没有说出口的必须留在广州的主要原因是：为我们传教会留一扇门，让传教士日后可以进入。⑥

表面上的借口是要为皇帝服务，以及安置老弱病残之人，实际上则是因为广州可以为传教士复入

---

①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8 号《两广总督孔毓珣等奏请准西洋人留居广州天主堂（1724 年 8 月 5 日）》，第 34 页。

②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8 号《礼部议复两广总督孔毓珣容西洋人留住广东事（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35 页。

③《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3 卷，《巴多明神父致本会某神父的信（1724 年 10 月 16 日）》，第 26 页。

④［捷］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 43 页。

⑤［丹麦］龙伯格著，李真、骆洁译：《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大象出版社，2009 年，第 18 页。

⑥［法］杜赫德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2 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某神父信（1724 年 10 月 16 日）》，第 334 页。

内地提供极大的方便，即“为我们教会留一扇门”。

二、雍正禁教期间驱逐到广州及原居广州的西教士

雍正元年禁教后，全国天主教除北京得以保护外，其他地区普遍遭受毁灭性打击。1724 年 10 月 16 日冯秉正写于北京的信札称：

> 多年来我们所担心并无数次预言过的一切终于于最近发生了：我们的圣教，在中国已被完全禁止，所有的传教士，除在北京的以外，都被逐出帝国，教堂或被拆除，或被派作渎神的用场；敕令已经颁布，基督徒必须放弃信仰，其他人不得信基督教，违者将被严惩。近二百年来花了我们无数心血建立起来的传教会，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①

冯秉正此语并不确切，因为冯秉正写信的 1724 年 10 月 16 日当时还是禁教的初期，全国的教堂并没有全部被摧毁或改作他用，传教士也没有全部被驱逐。1734 年 10 月 15 日，巴多明神父的信称：

> 1729 年 9 月，一个朝廷大臣上奏皇上，说在北京的欧洲人数目太大，有好些人是无用的，他们只会对中国人故弄玄虚，拉人进基督教。在各省，还有欧洲人藏在他们的信徒家中，有好些教堂都还没有改为公用场所，等等。②

但 1724 年时一批教堂已被摧毁或改作他用却是事实。如山西绛州天主堂，雍正二年改为东雍书院；③ 济南府的两座天主堂，雍正二年时，一改作育婴堂，一改作义学；临清天主堂则改作公所④；南京圣堂改为积谷仓⑤；苏州圣堂改为阙里别墅⑥；福安天主堂改作书院⑦。但在 1724 年时还是有部分教堂并没有被拆毁或改用，如上海老天主堂（敬一堂）改为关帝庙⑧，顺德天主堂则公开售卖⑨，杭州天主堂改为天后宫⑩，均是雍正八年后发生的事情。1724 年虽有部分传教士被赶到广州，后来甚至赶到澳门，但雍正初年开始禁教时，仍有很多传教士藏匿在各地进行秘密的地下传教。孟德卫（D. E. Mungello）认为，“1724 年传教士开始被驱逐以后，意大利方济各会士首先启用建立地下传教的策略，包括耶稣会在内的其他传教团体也纷纷效仿”⑪。据一份教会统计材料称，1725 年藏匿在各省的西洋传教士如下：

---

①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2 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某神父信（1724 年 10 月 16 日）》，第 314 页。

②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3 卷，《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本会杜赫德神父的信》，第 152 页。

③ 雍正十三年《东雍书院详文》，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 1 辑第 2 册，第 727—728 页。

④ 允禄、鄂尔泰等编：《雍正朱批谕旨》第 7 册《费金吾奏折》，雍正七年十月二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第 49 页。

⑤ 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第 2 章，第 41 页。

⑥ 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第 2 章，第 41 页。

⑦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3 号《福州府严禁福宁州及福安、宁德等县天主教事》（雍正元年八月初六日），第 25 页。

⑧ 阮仁泽主编：《上海宗教史》第 15 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626 页。按：上海敬一堂改为关帝庙的时间是雍正八年（1730）。

⑨ 郭汝诚：《（咸丰）顺德县志》卷 32，《杂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咸丰三年刊本，第 11 页。按：顺德天主堂出卖亦应在雍正八年后。

⑩ 杭州《天主堂改为天后宫碑记》，转引自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 162—165 页。杭州天主堂改为天后宫，亦在雍正八年。

⑪ ［美］孟德卫著，潘琳译：《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1785》，大象出版社，2009 年，第 145 页。

到雍正六年留在北京的教士有：外籍主教 1 位①，神父 6 位②，华籍神父 3 位③。同时，隐匿地下的教士有：南京潜居主教 1 位④，耶稣会神父 7 位⑤，方济各会神父 1 位⑥；陕西、山西、湖广、四川潜居主教 1 位⑦，中国神父 3 位⑧，耶稣会神父 2 位，方济各会神父 4 位⑨；潜居广州的耶稣会神父 15 位，方济各会神父 10 位⑩。

这份教会统计资料并不准确，雍正禁教期间在华传教士的分布实际可分为四大块：第一块是居留在北京的传教士；第二块是潜藏在各地的传教士；第三块是原来即在广州地区的传教士；第四块则是由各地驱逐到广州和澳门的传教士。这样划分，我们才能比较清楚地看出雍正禁教期间全国传教士的分布及其流向。

表 1　雍正禁教期间居留在北京的传教士⑪

会籍	国籍	中文名	西文名	身份	在京时间	备注
S. J.	法	白晋	Joachim Bouvet	历算家	1688—1730 年	1730 年北京逝世
	法	巴多明	Dominique Parrenin	翻译	1699—1741 年	
	法	雷孝思	Jean-Baptiste Régis	历算家	1717—1738 年	
	法	冯秉正	Moyriac de Mailla	历算家	1714—1748 年	
	法	安泰	Etienne Rousset	医生	1719—1758 年	
	法	宋君荣	Antoine Gaubil	历算家	1723—1759 年	
	法	孙璋	Alexandre de La Charme	翻译	1728—1767 年	
	法	沙如玉	Valentin Chalier	钟表匠	1728—1747 年	
	法	殷弘绪	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	非技艺人	1722—1741 年	
	法	杨保⑫	Jean-Baptist Jacques	历算家	1722—1728 年	1728 年广州逝世

---

① 1725—1733 年担任北京主教者为 Franc. de la Purification（da Rocha Froes）。

② ［法］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62—1773）》。据表 1 可知，当时在北京的西教士至少在 20 人以上，此处言 6 人，不知何指。

③ 雍正六年在北京的华籍神父：1720 年从罗马回国留在北京的樊守义（Louis Fan）神父及他的伙伴霍（P. Houo）神父。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62—1773）》，第 802—804 页。第三人不知何指。

④ 应指林安多主教（Antonie de Silva），与意大利 Antoine Xavier Morabito 神父中文名相同，此林安多为葡萄牙人，1707 年被铎罗大主教擢升为南京主教，后提出辞呈，但仍居南京。1725 年雍正教难后，他在南京城隐蔽下来，暗中施行传教。参见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62—1773）》，第 565 页。

⑤ 查到当时隐匿在南京教区的耶稣会神父至少有 9 人，即王石汗、毕多明、卜文气、索玛诺、彭加德、台维翰、林安多、秉多、何云汉等。

⑥ 疑为康和子（Carlos Orazi de Castorano）。

⑦ 此人应是 1728 年升任陕西、山西代牧主教的方启升（Franciscus Saracen）神父。

⑧ 1722 年遣使会穆天尺（Jean Mullener）为苏洪学（Paul Sou）进铎，1726 年又在广州为苏宏孝（Etienne Su）进铎，1730 年前穆天尺又为朱彼得（Pierre Tchu）进铎。后三位华籍神父均在四川传教。参见 Adrien Launay, *Histoire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Se-Tchoan*, Vol. 1, Paris: Téqui, pp. 104-105.

⑨ 疑为麦传世、费雷礼（Francois Marri Garetto de Ferreri）、劳佳碑（Gabriel a Taurino）、王方济（Franciscus Garretto）。

⑩ 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第 2 章，第 48 页。

⑪ 以下诸表，除注明出处者外，全部耶稣会士资料均来自于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荣振华著，耿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之各人物传。

⑫ 鞠德源：《清宫画家郎世宁年谱——兼在华耶稣会士史事稽年》（载《故宫博物馆院刊》1988 年第 2 期）称“康熙六十年（1721）五月法国教士杨保、宋君荣抵达广州，俱愿进京效力”，与荣振华、费赖之：《杨嘉禄传》所载事迹相同，故定清档之杨保即杨嘉禄。

续表 1

会籍	国籍	中文名	西文名	身份	在京时间	备注
S. J.	法	汤尚贤	Pierre Vincent de Tartre	历算家	1716—1724 年	1724 年北京逝世
	瑞士	林济各	François Louis Stadlin	钟表匠	1707—1740 年	
	德	戴进贤	Ignace Kögler	历算家	1717—1746 年	
	奥	费隐	Xavier-Ehrenbert Fridelli	历算家	1707—1743 年	
	捷	严嘉乐	Charles Slaviczek	音乐家	1717—1735 年	
	意	郎世宁	Joseph Castiglione	画家	1715—1766 年	
	意	罗怀中	Jean-Joseph da Costa	医生	1715—1747 年	
	意	法良①	François Folleri	建筑师	1721—1728 年	1728 年去澳门
	意	利博明	Ferdinand-Bonaventure Moggi	画家	1721—1761 年	
	葡	苏霖	José Suares	历算家	1688—1736 年	
	葡	徐懋德②	André Pereira	历算家	1724—1743 年	
	葡	麦有年	Paul de Mesquita	历算家	1726—1729 年	1729 年北京逝世
	葡	高嘉乐③	Carlos de Rezende	历算家	1725—1746 年	
	葡	索智能	Polycarpe de Sousa	非技艺人	1726—1757 年	
	葡	陈善策	Dominique Pinheiro	历算家	1726—1748 年	
	葡	张安多	António de Magalhães	翻译	1726—1735 年	
	中	樊守义④	Louis Fan	非技艺人	1725—1753 年	
	中	霍神父	P. Houo	非技艺人	1725—1753 年	
	澳门	何天章⑤	François-Xavier a Rosario	非技艺人	1725—1736 年	1736 年北京逝世

① 据鞠德源《清宫画家郎世宁年谱——兼在华耶稣会士史事稽年》（载《故宫博物馆院刊》，1988 年第 2 期）称，利博明与“能刻铜版”的西洋人法良于康熙六十年（1721）七月二十日从广州启程来京。查与利博明同时进京者，即荣振华与费赖之书中的“法方济各”。严嘉乐 1725 年 11 月 20 日的信称，住在葡萄牙耶稣会住院的人有：佛罗伦萨教士利博明，他是铜雕专家；还有一名佛罗伦萨人法良，他是作为军事建筑师来中国的，是住院的副总管。参见［捷］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 46 页。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67 号《广州府详报会审江南案涉案倪维智等人》，第 238 页称，法方济各于雍正七年（1729）三月初二由京起身，于是年六月二十八日到澳。

② ［捷］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 43 页载 1725 年 11 月 20 日严嘉乐的信称，葡萄牙人徐懋德曾在广州定居若干年，他是靠他的天文学知识而留居北京。

③ ［捷］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 43 页载 1725 年 11 月 20 日严嘉乐的信称，葡萄牙人高嘉乐，他是直隶正定的传教士，现任我们教省副会长，他是靠他的数学而留居北京。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10 号《中国教徒致神父书》，第 37 页中保存有 1725 年陕西西安教徒致耶稣会士高尚德书，高尚德即高嘉乐。可知，1725 年时，高尚德在陕西。

④ 樊守义，1720 年从罗马回国后，康熙帝召樊守义赴京，垂询艾若瑟神父的有关信息，遂留居京城。其间往来于直隶、盛京一带传教，直到 1753 年在北京逝世。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 681—682 页。

⑤ 何天章，字起文，生于澳门，父为欧洲人，母亲为华人。1701 年至 1718 年在山西传教，后被驱逐出境，安插至澳门，后又走京师。1731 年至 1735 年间返回山西，1736 年 5 月 11 日在北京逝世。参见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 412—413 页。而据雍正十三年《东雍书院详文》（第 727—728 页）称，已于雍正二年（1724）将广东澳门人何天章咨送澳门安插，与费赖之书所载歧异，则何天章应是雍正二年后才离开山西，先去澳门，至北京应该是再从澳门潜入，当在 1725 年以后。

续表 1

会籍	国籍	中文名	西文名	身份	在京时间	备注
P. F.	意	陆安①	Angelvs A Bvrgo Si Syrj	钟表匠	1720—1724 年	1724 年北京逝世
	意	格利马尔蒂②	Rinaldus Grimaldi	非技艺人	1720—1725 年	
	意	佛奥塔③	Volta	医生	1721—? 年	
	意	席若汉④	Joseph Vicedomini	雕刻家	1720—? 年	
	德	希佩尔⑤	Georgius Scipel	画家	1720—? 年	
	意	德理格⑥	Theodoricus Pedrini	音乐家	1711—1746 年	
	德	讷味达⑦	Wolfgang de la Nativilile	音乐家	1720—1731 年	1731 年返欧洲
	意	托马策利⑧	Nicolaus Tomacelli	画家	1720—1724 年	1725 年返欧洲
	意	加格里亚尔蒂⑨	Dionisius Gallardi	医生	1720—1724 年	1725 年返欧洲
	意	夏真多⑩	Hyacintvs Jordanvs	玻璃艺师	1727—1736 年	

---

① 高智瑜、［美］马爱德主编：《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栅栏》，澳门文化局，2001 年，第 177 页称："陆安，方济各会神父，1722 年来北京，1724 年逝世。"此陆安即［意］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104 页中的"康熙皇帝身边的钟表匠安吉洛（Angelo）神父"；亦即［捷］严嘉乐著，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1716—1735）》，第 45 页中的"北京的方济各会安格鲁姆（Angelum）神父。"此陆安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随嘉乐使团来华，稍后进北京。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下册，台北光启出版社，1991 年，第 146 页。

② ［捷］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 45 页称："留在北京的有传信部圣衣会神父格利马尔蒂（视察员）。"当是嘉乐使团成员 Rainaldus M. a S. Joseph，见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下册，第 146 页。

③ ［意］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第 100 页称，1721 年，米兰传教士兼内科医生佛奥塔博士在北京畅春园为康熙看病。

④ 席若汉为嘉乐使团成员之一，参见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下册，第 146 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 1 册第 84 号档，《两广总督杨琳等奏报到有西洋人三名及年内澳门港进出西洋船只书目折》，第 128 页称："席若汉会雕刻木石、人物、花卉，兼会做玉器。"

⑤ ［捷］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 45 页称，1725 年，传信部巴伐利亚雕塑家希佩尔在北京。［意］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第 100 页称，1721 年时，皇上对希普（Scipel）的雕塑很满意，此希普即希佩尔。希佩尔亦是嘉乐使团的成员之一，见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下册，第 146 页。

⑥ 高智瑜、［美］马爱德主编：《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栅栏》之《圣未瞻爵会士德公之墓》，第 285 页；［法］方立中（J. van Den Brandt）著，耿升译：《1697—1935 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550 页；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中华书局 1988 年，第 349—360 页。

⑦ 鞠德源：《清宫画家郎世宁年谱——兼在华耶稣会士史事稽年》，载《故宫博物馆院刊》，1988 年第 2 期。讷味达是嘉乐使团成员中"会弹琴的二名"之一。参见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下册，第 145—146 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 1 册，第 85 号《两广总督杨琳等奏报西洋教化王使臣嘉乐及随行人员到澳门情形折》，第 129 页。此一"讷味达"，丛林、李梅译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一书译为"那永福"，不知译者为何将 Wolfgang de la Nativilile 一人译为那永福。那永福为乾隆九年入华的教廷传信部圣衣会士，Wolfgang de la Nativilile 为康熙五十九年随嘉靖乐使团入华的音乐家，译者仅根据译音将那永福与 Wolfgang de la Nativilile 混淆，给学界徒增歧误。

⑧ ［捷］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 45 页称，1725 年，教廷传信部召回了在北京的画家托马策利神父。托马策利是嘉乐使团成员之一。参见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下册，第 145 页。

⑨ ［捷］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 45 页称，1725 年，教廷传信部召回了在北京的外科医生加格里亚尔蒂神父。加格里亚尔蒂是嘉乐使团成员之一。参见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下册，第 146 页。

⑩ 高智瑜、［美］马爱德主编：《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栅栏》之《十字会士夏公之墓》，第 279 页注释 2 称，传信部派他作为眼镜师进京为雍正帝服务。他乘坐比利时的船来到中国，于 1727 年 8 月 6 日离开广州，当年 10 月 21 日到达北京。1728 年 6 月 21 日，他和其他三名传教士受到雍正帝的接见。

据上表，雍正禁教期间在北京居留的传教士共有 39 人，其中“系精通历数及有技能”合法居留北京者有 33 人，非技艺人而非法居留者为 6 人。

表 2　雍正禁教期间藏匿在全国各地秘密传教的传教士

会籍	国籍	中文名	西文名	藏匿地及时间	备注
P. F. ①	意	方启升	Franciscus Saracen	1723—1741 年在陕西山西	
	意	王方济	Franciscus Garreto	1726—1738 年在山西	
	意	费雷礼②	Francois M. G. de Ferreri	1725—? 年在湖广	
	意	叶崇贤③	Joannes Bapt. Maoletti	1723—1725 年在湖广	1725 年去世
	意	康和子④	Carlos Orazi de Castorano	1724—1733 年在直隶山东	
	意	劳佳碑	Gabriel a Taurino	1720—? 年在山西	
	意	李奥哲	Eugenius Piloti	1731—? 年在山西	
	意	索玛诺	Simpliciano Sormano	1728—1729 年在直隶	
	意	布彻	Giovanini Antonio Buocher	1732—? 年在直隶山东	
O. F. M. ⑤	西	魏列纳	Juan de Villena	1724 年后一直在山东	
	西	欧都诺	Juan Bautista Ortuño	1728 年后一直在江西	
	西	卜耐义	Joseph Bornay	1727—? 年在江西	
	西	丁迪我	Diego de S. José	1726 年后一直在福建	
	西	安东尼	Antonio de Almadén	1729—1735 年在山东	
O. P.	西	白多禄	Pedro Sanz	1724—1729 年在福建⑥	1730 年去澳门
	西	马熹诺	Magíno Vetallol	1724—1729 年在福建	
	西	赖白多禄	Pedro Barreda	1723—1726 年在福建	1726 年逝世
	西	赵弥格	Miguel de Arriba	1723 年后匿藏福建	
	西	颜欧诺弗	Onofre Bas	1723 年后匿藏福建	
	西	韩保禄	Pablo Matheu	1723 年后匿藏福建	
	西	罗巴拉斯	Blas de Sierra	1723 年后匿藏福建	

① 本表传信部的传教士均为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其资料主要来源于韩承良：《中国天主教传教历史：根据方济会传教历史文件》，台北思高圣经学会出版社，1994 年，第 59—60 页；李少峰：《方济各会在华传教史》，载罗光主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征祥出版社，1967 年，第 89—91 页，第 99—100 页；孟德卫《灵与肉：山东天主教，1650—1785》，第 145—147 页。

② ［捷］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 44 页严嘉乐 1725 年 11 月 20 日的信称：“方济各会士费雷礼神父，他藏身该地（湖广），居无定所。”

③ 李少峰：《方济各会在华传教史》，载罗光主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第 108—109 页。［捷］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 44 页严嘉乐 1725 年 11 月 20 日的信称：“留在湖广的有方济各会士叶崇贤，他不久前去世。”

④《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2 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神父的信（1724 年 10 月 16 日）》，第 340—341 页称，雍正禁教开始，康和子也计划前往北京。孟德卫《灵与肉：山东天主教，1650—1785》，第 145 页称，1724 年 11 月 29 号，他到达北京传信部的驻地。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康和子都住在海淀和京城。

⑤ 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中华书局，2006 年，第 363—364 页。［美］孟德卫：《灵与肉：山东天主教，1650—1785》，第 166 页，第 171 页。李少峰：《方济各会在华传教史》，载罗光主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第 79 页。

⑥ José Maria Go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2, pp. 176—179 及郑天祥编译《流血记》，第 6 章，澳门慈幼印书馆，1950 年，第 49—71 页称，白多禄先是藏在福安，后转往漳州。至 1730 年 2 月又到广州，随后去澳门。雍正禁教时，马熹诺亦藏匿在漳州。

续表 2

会籍	国籍	中文名	西文名	藏匿地及时间	备注
O. P.	西	黄瑟伯	Eusebio Hoscote	1723 年后匿藏福建①	1730 年去澳门
	西	华敬	Joaquín Royo	1723 年后一直在福建②	
	西	德黄正国	Francisco Serrano	1728 年后一直在福建③	
	西	胡玛窦	Mateo Villafaña	1727 年后一直在福建	
	西	费若用	Juan Alcober	1728 年后一直在福建④	
	西	圣哥	Juan de la Cruz y Moya	1733 年在福建	
	西	万济公	Francisco Sáenz	1733 年在福建⑤	
	西	陆迪仁	Louis Maggi	1732—1735 年在湖广⑥	
S. J.	比	王石汗⑦	Pierre Van Hamme	1723—1727 年在江南松江	1727 年逝世
	法	卜文气	Louis Porquet	1724—1729 年在江南平湖⑧	1732 年至澳门
	法	彭加德	Claude Jacquemin	1724—1729 年在江南各地	1732 年至澳门
	波	台维翰	Jean-Baptiste Bakowsk	1723—1726 年在江南松江	1726 年去马尼拉
	意	林安廉	António da Silva	1724—1725 年在江南南京	1726 年逝世
	葡	安玛尔	Martin Correa	1727—1735 年在江南松江⑨	

① 从赖白多禄到黄瑟伯等 6 人藏匿福建事，见 José Maria Go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2, p. 164. 但黄瑟伯与罗巴拉斯两人由于是雍正元年福安教案的导火索，当时已被当地政府驱逐。他们二人离开了福安，前往广东，于 1724 年 11 月底到达广州。二人在广州呆的时间不久，至 1726 年初又潜回福安传教。

② José Maria Go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2, p. 164, pp. 255-264；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33 号《福建漳州府漳浦县袁本濂、邵武府建宁县王文昭会审福安天主教案招册》，第 84—85 页。

③ José Maria Go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2, pp. 186-187, pp. 203-207；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33 号《福建漳州府漳浦县袁本濂、邵武府建宁县王文昭会审福安天主教案招册》，第 91 页。雍正禁教时，胡玛窦藏匿各地，与德黄正国同。

④ José Maria Go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2, p. 164, pp. 186-187, pp. 255-260；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33 号《福建漳州府漳浦县袁本濂、邵武府建宁县王文昭会审福安天主教案招册》，第 101 页。该书称，费若用到福安的时间是雍正八年（1730）。

⑤ José Maria Go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2, pp. 241-253；《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5 册，第 688—691 页载，圣哥、万济公于 1733 年被捕，分别被解送回吕宋和澳门。

⑥ JM, March-April 1734, Archives des Missions Ètrangères, Vol. 433, p. 735.

⑦ ［捷］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 45 页载 1725 年 11 月 20 日严嘉乐的信称，巡视员王石汗神父仍在镇江。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9 号《江苏巡抚张楷查西洋人分别起送安插事（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第 35 页将王石汗作王以仁，并称，1725 年 10 月时，王以仁在丹徒县，并准备进京效用。

⑧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67 号《广州府详报会审江南案涉案倪维智等人》，第 238 页称，卜文气为薄类思，并称其："于雍正八年五月二十日自江南起身，于是年七月二十七日回到澳门。"

⑨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67 号《广州府详报会审江南案涉案倪维智等人》，第 238 页称，安玛尔为安玛尔底玉，并称其："于雍正元年八月十九日到广，直往江南，于雍正十一年八月初一日自江南起身，于是年八月二十七日回澳。"

续表 2

会籍	国籍	中文名	西文名	藏匿地及时间	备注
S. J.	葡	秉多	Manuel Pinto	1725—1726 年在江南松江①	1729 年至澳门
	葡	聂若望	Jean Duarte	1723—1736 年在湖广湘潭	
	葡	纪类思②	Louis de Sequeira	1726—1735 年在湖广武昌	
	葡	德吉人	Francisco Alberto	1723—1732 年在广东广西	
	葡	乐玛诺	Manuel Ribeiro	1723—1735 年在广州雷州	
	葡	毕多明③	Dominique de Britto	1723—1726 年在江南松江	
	葡	索玛诺	Manuel de Souza	1723—1729 年在江南镇江	1732 年至澳门
	葡	何云汉	Etienne Peixoto	1723—1735 年在常熟淮安	
	澳门	龚尚实④	Thomas da Cruz	1723—1735 年在福建江南	1728 年至关外
C. M.	德	穆天尺	Jean Müllener	1723—1735 年在四川各地⑤	
	中	苏鸿孝	Paul Sou	1723—1733 年在四川各地⑥	
	中	徐德望	Ėtienne Siu	1723—1733 年在湖广沙市⑦	
M. E. P.	法	马青山	Joachim Enjobert de Martiliat	1732—1735 年在四川湖广⑧	

据上表统计，雍正禁教期间潜藏在全国各地秘密传教的传教士共有 48 人，其中传信部 9 人，西班牙方济各会 5 人，西班牙多明我会 15 人，耶稣会 15 人，遣使会 3 人，巴黎外方传教会 1 人；以潜藏地统计，山西、陕西 4 人，湖广 6 人，直隶、山东 5 人，江西 2 人，福建 16 人，江南 10 人，广东、广西 2 人，四川 3 人。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在福建传教的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除罗巴拉斯和黄瑟伯两人被遣往广州外，几乎全部匿藏在福建各地秘密传教。

---

①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67 号《广州府详报会审江南案涉案倪维智等人》，第 238 页称，秉多为秉多玛诺，并称其："于康熙五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到广，直往江南，于雍正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自江南起身，于是年九月初九日回到澳门。"

②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67 号《广州府详报会审江南案涉案倪维智等人》，第 238 页将纪类思作季履思，并称其："于雍正四年八月十九日到澳门，住有九年，于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搭船回本国，那人年有五十六岁，并未曾出澳往外省。"此处记载不实。雍正四年来华后，纪类思即潜往内地传教，在武昌府隐藏，在湖广坚持传教二十多年。乾隆初年返回澳门，并两度担任副省会长职务，兼任澳门神学院院长。1762 年被澳葡政府拘捕，押送回国。

③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67 号《广州府详报会审江南案涉案倪维智等人》，第 238 页将毕多明作毕登荣。

④ José Maria Go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2, pp. 190—191 载 1929 年 10 月 18 日，龚尚实在福州成立天主堂，做完弥撒，被福州知府下令逮捕。费赖之书亦称，龚尚实曾入狱一次，1734 年至 1735 年重返江南。［捷］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 44 页称，1725 年时留在福建省的有中国耶稣会士龚尚实。

⑤ Joseph Dehergne, *La Chine du Sud-ouest*: *Le Szechwan*, *le kweichow*, *Ėtude de Géographie Missionnaire*, pp. 246-276. ［捷］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 43 页称："（1725 年）湖广主教穆天尺私自来北京，后来又自动离开宫廷去广州。"《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2 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神父的信（1724 年 10 月 16 日）》，第 340—341 页亦称，一听到禁教的消息，穆天尺先生立即躲到了北京。

⑥ ［法］方立中著，耿升译：《1697—1935 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第 550 页。

⑦ ［法］方立中著，耿升译：《1697—1935 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第 550 页。Noël Gubbels, Trois Siècles d'Apostolat——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à 1870, Franciscan Press, 1934, p. 147.

⑧ Archives des Missions Ėtrangères, Vol. 433, p. 520, p. 597, p. 732.

表3　雍正禁教期间原居停广州的传教士

会籍	国籍	中文名	西文名	在广州时间	备注
S. J.	法	张貌理	Maurice du Baudory	1719—1732 年	1732 年广州逝世
	法	戈维里①	Pierre de Goville	1708—1724 年	1724 年回国
	葡	房日升②	Francesco de Cordes	1717—1732 年	1732 年去澳门
	葡	李若望	João Pereira	1722—1724 年	1725 年去暹罗 1732 年在澳门
	法	胥孟德	Joseph Labbe	1722—1725 年	1731 年去湖广
	澳门	郭天庞	João Pacheco	1694—1724 年	1725 年澳门逝世③
	比	储斐理④	Philippe Cazie	1711—1732 年	1732 年去澳门
	葡	范若瑟	José Almeida	1712—1724 年	1724 年往暹罗
O. F. M. ⑤	西	欧都诺	Juan Bautista Ortuño	1721—1728 年	1728 年去江西
	西	巴伦嘉	S. José Palencia	1697—1726 年	
	西	桑托斯	Francesco de los Santos	1724—1726 年	1732 年去澳门
	西	安东尼	Antonio de Almadén	1724—1726 年	1729 年去山东⑥
	西	卜耐义	Joseph Bornay	1721—1726 年	1727 年往江西
	西	丁迪我	Diego de S. José	1721—1726 年	1726 年去福建
	西	罗格	Roque de la Soledad	1721—1731 年	1731 年广州逝世
	西	安哆呢	Antonio de la Concepcion	1697—1732 年	1732 年去澳门
	西	魏列纳	Juan de Villena	1721—1726 年	1727 年去山东⑦
	西	艾色	Thomás de S. Maria	1714—1726 年	1732 年去澳门
	西	马柯	Silvestre Marco	1726—1729 年	1729 年往福建被捕逐出境
	西	圣安东尼奥	Fernando de San Antonio	1726—？年	
	西	维拉卡斯丁	Francesco de Villacastin	1721—1726 年	
	西	瓦尔德佩尼亚	Valdepeñas	1721—？年	
	西	克利托巴尔	Cristóbal de Cañaveruelas	1721—？年	

① ［美］史景迁著，黄秀吟、林芳梧译：《胡若望的疑问》，唐山出版社，1996 年，第 106 页载，1724 年戈维里乘一艘英国船返回欧洲，1725 年他曾在法国看望胡若望。

②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 1 册，第 125 号《广州城守护将毛克明奏报西洋人方玉章设教惑众逐往澳门情由折》，第 172 页，方玉章即方日升。

③ ［法］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62—1773）》，第 538 页称郭天庞 1725 年被驱逐出境后去了暹罗。

④ ［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册，中华书局，1995 年，第 124 页将储斐理译为朱耶芮，并称朱耶芮 1722 年 6 月 13 日于广州患麻风病而死，疑荣说为误，《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 1 册，第 124 号《广东巡抚鄂弥达奏闻驱逐广州各堂堂主至澳门将教堂改作公所折》，第 170 页称雍正十年（1732），广州芦排巷天主堂副堂主之名仍为朱耶芮。1734 年巴多明神父的信称，“我们现在本教区共有 13 人”，其中就有朱耶芮（《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4 卷，《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同一耶稣会中尊敬的某神父的信》，第 122 页。可证，朱耶芮于 1734 年以后仍然在世。

⑤ 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第 362—365 页。

⑥ ［美］孟德卫：《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1785》，第 166 页。

⑦ 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第 364 页称魏列纳 1724 年赴山东，但却又言魏列纳 1726 年在广州，自相矛盾，疑 1724 为 1727 之误。［美］孟德卫：《灵与肉：山东天主教，1650—1785》，第 171 页称魏列纳 1727 年在山东。

续表 3

会籍	国籍	中文名	西文名	在广州时间	备注
P. F.	意	佩洛尼	Domenico Perroni	1721—1727 年①	
	葡	闵明我	Arcangelo Miralta	1724—1732 年②	1732 年去澳门
	意	艾劳迪	Tiburce Airoldi	1725—1726 年③	1726 年广州逝世
	意	索玛诺	Simpliciano Sormano	1725—1727 年④	1728 年去直隶
	意	布彻	Giovanini Antonio Buocher	1731 年⑤	1732 年去直隶
M. E. P.	法	计有纲⑥	Antoine de Guignes	1710—1732 年	1732 年去澳门
	中	李安德	André Ly	1726—1732 年⑦	1726—1729 年在福建
	中	党怀仁	Antoine Tang	1731 年⑧	
	法	安东·吉奈	Antonie Guignes	1717—1728 年	1728 年回国
	法	安东·郭奈	Antoine Connain	1729—1735 年	1732 年去澳门⑨
	法	诺神父	Noël de Noinville Gléfier	1728 年	不久即回欧洲⑩
	法	艾神父⑪	Joachim de Martillat	1729—1732 年	1732 年去澳门

① ［美］史景迁著，黄秀吟、林芳梧译：《胡若望的疑问》，第 3，第 111 页；［美］孟德卫：《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1785》，第 146 页。

② *Sinica Franciscana*, Vol. Ⅹ, p. 373；［美］孟德卫：《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1785》，第 156 页；《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2 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神父的信（1724 年 10 月 16 日）》，第 340—341 页称，葡萄牙方济各会士南京代理主教，教廷传信部神职人员闵明我于 1724 年已经到达广州。

③ ［美］孟德卫：《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1785》，第 146 页。

④ ［美］孟德卫：《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1785》，第 146 页。

⑤ ［美］孟德卫：《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1785》，第 149 页。

⑥ 巴黎外方传教会士计有纲、遣使会士毕天祥均因铎罗与康熙帝的中国礼仪之争而被囚禁在广州，至雍正四年（1726）七月十三日，“援释放德里格之例，将广东监禁之毕天祥、计有纲一体施恩释放”。见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13 号《广东巡抚杨文乾为遵旨释放毕天祥、计有纲事》，第 38—39 页。又据普拉特：《历史回忆录》卷 7，第 373—379 页，毕天祥与计有纲主教分别于 1710 年 7 月 20 日和 22 日被囚于广州，二人都与铎罗使团有关，都在 1726 年获释。转引自［美］魏若望著，吴莉苇译：《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第 250 页。又据［捷］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 28 页，严嘉乐 1716 年 11 月 18 日在广州的信则称，“在广州居住着两名世俗教士：意大利人毕天祥和法国人计有纲。他们曾多次看望过我们，尊贵的计有纲先生还教一些中国青年人拉丁文，经他的教诲，其中两人不仅会读写拉丁文，还加入了教会。”可见，清政府关押计有纲和毕天祥，实质上只是软禁，可以说连软禁都谈不上，因为他们还可以传教。而西方资料多称他们在牢狱中受了 20 多年的罪，恐怕言辞不实。

⑦ Adrien Launay, *Histoire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Se-Tchoan*, Vol. 1, Paris: Téqui, P. 117 载 1726—1729 年间李安德曾到福建 Hing-Hoa 传教。

⑧ Adrien Launay, *Histoire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Se-Tchoan*, Vol. 1, Paris: Téqui, P. 117.

⑨ Gérard Moussay et Brigitte Appavou, Répertoire des Membres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1659—2004）, Archives de MissionsÉtragères, Paris, 2004, pp. 67—70. 中译本《1659—2004 年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列传》，第 844 页在此处误译，称 Connain1729 年赴中国，于 1723 年继任吉涅（吉奈，Guignes）神父主持广州司库部。应该是 1729 年赴中国，并继任 1723 年担任广州司库部的吉涅神父的职务。因为从 1717—1728 年，Guignes 一直担任广州司库。

⑩ ［法］热拉尔·穆塞等编,耿升译：《1659—2004 年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列传》，第 953 页。

⑪ ［法］热拉尔·穆塞等编,耿升译：《1659—2004 年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列传》，第 870 页。

续表 3

会籍	国籍	中文名	西文名	在广州时间	备注
O. P.	西	郭多禄	Pedro Muñoz	1715—1728 年①	
	西	谢德明	Manuel Tennrio	1727—1732 年②	1732 年去澳门
	西	德黄正国	Francisco Serrano	1727—1728 年	1728 年去福建
	西	胡玛窦	Mateo Villafaña	1727—1728 年③	1728 年去福建
	西	费若用	Juan Alcober	1728—1729 年	1729 年去福建④
	西	马晋	Magin Ventallol	？—1730 年	1730 年在广州病逝⑤
C. M.	意	毕天祥	Ludovicus Appiani	1710—1732 年⑥	1732 年去澳门

据上表，雍正禁教期间原居停广州的传教士共有 42 人，其中耶稣会 8 人，西班牙方济各会 15 人，传信部 5 人，巴黎外方传教会 7 人，西班牙多明我会 6 人，遣使会 1 人。进入广州地区的传教士除原居停的 39 人外，还有从全国各地被驱逐到广州的传教士。

据严嘉乐 1725 年 11 月 20 日写于北京的信（1725 年中国的传教工作报告）记载，光被遣送到广州的各派天主教传教士人数就有 29 人：

> 被驱逐的人有：山东省全体传教士，即方济各会士 5 人，耶稣会士 1 人；山西省中国耶稣会士 1 人；河南省耶稣会士 2 人；陕西省梅树生主教以及方济各会士 1 人，耶稣会士 1 人；湖广耶稣会士 4 人；江西耶稣会士 4 人，方济各会士 3 人；广西省耶稣会士 1 人；江南耶稣会士 3 人；福建多明我会士 2 人。⑦

严嘉乐公布的数据并不准确，我们根据各种资料将 1725 年 11 月前遣往广州的传教士统计如下：

---

① José Mari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2, p. 120.

② José Mari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2, p. 120；《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 1 册，第 124 号《广东巡抚鄂弥达奏闻驱逐广州各堂堂主至澳门将教堂改作公所折》，第 170 页。

③ 德黄正国及胡玛窦事，见 José Mari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2, pp. 114—116。

④ José Mari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2, p. 187；郑天祥编译：《流血记》第 6 章，第 54—55 页。德黄正国与费若用本来是同船从西班牙出发的，但到马尼拉后，曾在当地传教 1 年，故至 1728 年年底才到澳门，而到福安的时间应该在 1729 年。

⑤ 郑天祥编译：《流血记》第 7 章，第 69 页称，马老主教系于这年的正月在广州逝世。白主教当即正式成为宗教代牧，兼理浙、赣两省教务；第 62—63 页称，1730 年 2 月中旬，白多禄到达广州，已被教廷简为福建宗座代牧。可知，马主教是在 1730 年正月去世。

⑥ 见计有纲注。

⑦ ［捷］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 43 页。严嘉乐所指 1725 年 11 月前前往广州的传教士当为：山东的方济各会士 5 人：南怀德、巴廉仁、景明亮、卞述芳和卞述济；山东的耶稣会士 1 人：徐茂盛；山西的耶稣会士 1 人：何天章；河南的耶稣会士 2 人：骆保禄和孟正气；陕西方济各会士 2 人：梅树生和麦传世；湖广耶稣会士 4 人：赫苍璧、聂若翰、樊公元和顾铎泽；江西耶稣会士 4 人：利国安、龚当信、席宾和马若瑟；江西方济各会士 3 人：罗铭恩、华夏宁和王雄善；广西耶稣会士 1 人：金澄；江南耶稣会士 3 人：郭中传、张方济和德玛诺；福建多明我会士 2 人：罗巴拉斯和黄瑟伯。而据笔者的统计，1725 年 11 月前驱往广州的西教士应不止上述人数。

表4　1725年11月前遣往广州的传教士

会籍	国籍	中文名	西文名	原传教地	备注
O. F. M.	西	南怀德	Miguel Fernandez Oliver	山东	1726年返马尼拉
	西	巴廉仁	Frabcisco de S. Jose	山东	1732年去澳门
	西	景明亮	Martín Alemán	山东	1726年回国
	西	卞述芳	Migue de Torrejòn	山东	1732年去澳门
	西	卞述济	Francisco de la Concepciòn	山东	1732年去澳门
	西	罗铭恩	Miguel Roca	江西	1732年去澳门
	西	华夏宁	Diego de Santa Rosa	江西	1732年去澳门
	西	王雄善①	Juan Fernandez Serrano	江西	1726年回国
P. F.	意	梅树生	Antonius da Castrocaro Laghi	陕西	1726年返西安1727年逝世
	意	麦传世②	Franciscus Jovino	陕西	1732年去澳门
S. J	意	徐茂盛	Jacques-Philippe Simonelli	山东	1726年返内地
	意	骆保禄	Jean-Paul Gozani	河南	1732年去澳门不久逝世
	法	孟正气③	Jean Domenge	河南	1732年去澳门
	意	利国安④	Jean Leaureati	江西	1727年澳门逝世
	德	席宾	Philippe Sibim	江西	1725年去马六甲
	法	马若瑟	Marie de Prémare	江西	1732年去澳门⑤
	法	德玛诺	Romain Hinderer	江南	1725年返杭州1732年去澳门
	葡	习展	Marc Silveiro	广西	1725年去暹罗
	法	卜日升⑥	Jean Baborier	江南	1726年返江南

---

① 王雄善以上8名西班牙方济各会士数据，参见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第363页；［捷］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43页；［美］孟德卫：《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1785》，第135页。

② ［捷］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43页称，1725年被驱逐的人有：陕西省梅树生主教以及方济各会士一人。该信还称，方济各会士梅树生神父和一个方济各会士躲藏在陕西。这位方济各会士应指麦传世。麦传世于康熙五十一年到甘肃兰州传教，雍正二年被遣往广东。参见《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第157号《甘肃巡抚黄廷桂奏覆遵旨访缉并无西洋传教士在境折》，第224页。

③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67号《广州府详报会审江南案涉案倪维智等人》，第238称，河南送到孟正气一名。《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2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神父的信（1724年10月16日)》，第340—341页亦称，孟正气神父已于9月初从河南动身到广州。

④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67号《广州府详报会审江南案涉案倪维智等人》，第238称，江西送到西洋人利国安三名。《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2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神父的信（1724年10月16日)》，第340—341页则称，利国安等3人于1724年10月16日之前尚在江西，时间有差异。

⑤ ［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第518页称马若瑟于1733年又被放逐到澳门，但据马若瑟1733年5月的信札，1732年4月20日传教士被遣返至葡萄牙管辖的澳门。参见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第78页。

⑥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67号《广州府详报会审江南案涉案倪维智等人》，第238页将卜日升作沈若望，并称其："于康熙五十七年五月一日到广，直往江南，于乾隆十一年八月初三日在江南起身，于是年四月十八日回到澳门。"此处只记其第二次驱逐，而未载其第一次从湖广驱逐。荣振华、费赖之书均有沈若望一人，但此沈若望为1743年抵华，与上述资料不合。

续表 4

会籍	国籍	中文名	西文名	原传教地	备注
S. J	葡	李国成①	Gajétan Lopes	广西	1725 年至澳门，1727 年至北京
	葡	德梅洛	Antonio de Melo	海南	1725 年去暹罗和交州
	中	何天章	Francisco-Xavier a Rosario	山西	1727 年返山西
	中	张儒良	Gonzaga Tchang	湖广	1730 年广州逝世
	葡	鲁伯都	Pedro da Costa	江南	1724 年后到江西
	葡	李若瑟②	José Pereira	江南	1731 年澳门逝世
	奥	金亮③	Balthasar Miller	广东	1727 年返德国
	葡	陆玛诺	Manuel Ribeiro	广东	1724 年被迫离境
	葡	杨若翰④	Jean de Saa	江南	1725 年去澳门，1731 年逝世
	葡	瞿良士⑤	Manuel de Mata	江南	1725 年去暹罗
	葡	安道义⑥	Antoine Ferreira	江南	1725 年去交趾支那
	法	郭中传⑦	Jean-Alexis de Gollet	江南	1732 年去澳门
	葡	张方济	François de Silva	江南	
	法	龚当信⑧	Cyr Contancin	江西	1731 年返法国
	法	赫苍璧	Julien-Placide Hervieu	湖广	1732 年去澳门
	法	聂若翰	Jean Noëlas	湖广	1732 年去澳门
	法	樊公元⑨	Jean-Joseph-Simon Bayard	湖广	1725 年广州逝世
	法	顾铎泽	Etienne-Joseph Le Couteulx	湖广	1727 年返湖广
	葡	金澄	Manuel Camaya	广西	1728 年广州逝世
O. P.	西	罗巴拉斯	Blas de Sierra	福建	1726 年潜回福安
	西	黄瑟伯	Eusebio Hoscote	福建	1726 年潜回福安

① 荣振华书作李国成，费赖之书作罗佩思。《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2 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神父的信（1724 年 10 月 16 日）》，第 340—341 页。1724 年冯秉正的信后载，李国成已经到达广州。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8 号《两广总督孔毓珣等奏请准西洋人留住广州天主堂（雍正二年六月十七日）》，第 34 页将李国成作李国善，并称，今广西送到西洋人李国善一名。

②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2 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神父的信（1724 年 10 月 16 日）》，第 340—341 页。1724 年冯秉正的信后载，李若瑟已经到达广州。

③ 荣振华书作金亮，费赖之书作米来迩。《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2 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神父的信（1724 年 10 月 16 日）》，第 340—341 页。1724 年冯秉正的信后载，金亮已经到达广州。

④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67 号《广州府详报会审江南案涉案倪维智等人》，第 238 页将杨若翰作杨若望，并称其："于康熙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到广，直往江南，于雍正二年十月初三日自江南起身，于是年九月初九日回到澳门。雍正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澳身故。"该书第 9 号《江苏巡抚张楷查西洋人分别起送安插事（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第 35 页将杨若翰作阳若望，并称 1725 年 10 月之前，长州县有阳若望径自回澳。

⑤ ［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册，第 419 页称瞿良士 1724 年 8 月 25 日在澳门逝世。

⑥ 费赖之书作安道义，荣振华书作安怀信。

⑦ ［法］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62—1773）》，第 672 页称郭中传于 1727 年被流放广州。

⑧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67 号《广州府详报会审江南案涉案倪维智等人》，第 238 页称，龚当信 1724 年 11 月后与马若瑟等从江西前往广州。龚当信到广州后，又被法国传教会于 1731 年派回法国汇报中国传教团的情况，但于 1732 年死于返华途中。

⑨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8 号《两广总督孔毓珣等奏请准西洋人留住广州天主堂（雍正二年六月十七日）》，第 34 页将樊公元称为方西满，并称，湖广送到西洋人方西满等四名。

据上表，1725 年 11 月前驱逐到广州的传教士共有 40 人，其中方济各会 8 人，传信部 2 人，耶稣会 28 人，西班牙多明我会 2 人。雍正初年禁教时，还有一批传教士在中国教友的保护下潜居下来。但从 1725 年至 1729 年，又有一部分潜居的传教士被抓捕，并被驱逐到广州。

表 5　1725 年 11 月以后驱逐到广州的传教士

会籍	国籍	中文名	西文名	原传教地	备注
S. J.	法	杨嘉禄①	Jean-Baptist Jacques	北京	1728 年广州逝世
	意	法方济各	François Folleri	北京	1729 年去澳门
	葡	毕登庸②	Antoine de Costa	江南	1730 年去澳门
	法	卜文气③	Louis Porquet	江南	1729 年去广州，1732 年去澳门
	葡	孟由义④	Manuel Mendes	江南	1726 年去澳门
	葡	毕多明⑤	Dominique de Britto	江南	1730 年去澳门
	葡	索玛诺⑥	Manuel de Souza	江南	1727 年去广州，1732 年去澳门
	法	彭加德⑦	Claude Jacquemin	江南	1729 年去广州，1732 年去澳门

---

① 荣振华书作杨嘉禄，费赖之书作雅嘉禄。

②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2 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神父的信（1724 年 10 月 16 日）》，第 340—341 页称，利国安神父和被从九江教堂驱逐的马若瑟神父均在江西省会南昌府，他们在那里只是为了等龚当信神父的到来。三人将一起被带到该省赣州府，在那里与葡萄牙耶稣会士毕登庸神父会齐后再前往广州。1724 年 10 月冯秉正的信后还附有编者的话，称：“马若瑟、龚当信、利国安和毕登庸一道到达广州。”据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9 号《江苏巡抚张楷查西洋人分别起送安插事（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第 35 页称，毕登庸因患病在华亭县，尚未启程来广。可证，书简集所言不确，毕登庸到广州应是 1725 年以后的事情。

③ ［捷］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 45 页载 1725 年 11 月 20 日严嘉乐的信称，法国人卜文气仍在浙江。可见，卜文气赴广州是在 1725 年 11 月以后。

④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67 号《广州府详报会审江南案涉案倪维智等人》，第 238 页将孟由义作孟友艺，并称其：“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到广，直往江南，于雍正四年八月十三日自江南起身，于是年十月二十日回澳。”第 9 号《江苏巡抚张楷查西洋人分别起送安插事（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第 35 页称，1725 年 10 月时孟由义在上海县。［捷］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 45 页载 1725 年 11 月 20 日严嘉乐的信亦称，孟由义神父仍在上海。

⑤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67 号《广州府详报会审江南案涉案倪维智等人》，第 238 页将毕多明作毕登荣，并称其：“于康熙四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到广，直往江南，于雍正八年六月初四日自江南起身，于是年八月二十七日回澳。”［捷］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 45 页载 1725 年 11 月 20 日严嘉乐的信称，毕多明仍在松江。《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2 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神父的信（1724 年 10 月 16 日）》，第 340—341 页称，葡萄牙神父毕多明可能于 1724 年 10 月初出发去广州。如上引档案和数据无误，则毕多明 1724 年并未动身，而是到雍正八年（1730）才动身去广州。

⑥ ［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第 643 页称索玛诺“于 1717 年 9 月 12 日又被流放到澳门”，此处“1717”当为“1727”之误，而［法］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62—1773）》，第 714 页则称 1729 年后流放广州。

⑦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2 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神父的信（1724 年 10 月 16 日）》，第 340—341 页称，法国神父彭加德可能于 1724 年 10 月初出发去广州。而费赖之书称彭加德 1724 年仇教事起，隐居江南各地凡 5 年，1729 年解赴广州。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 45 页载 1725 年 11 月 20 日严嘉乐的信亦称，法国人彭加德在江苏，由于皇帝没有说话，各省总督也就宽容了一些。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9 号《江苏巡抚张楷查西洋人分别起送安插事（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第 35 页将彭加德作彭觉世，并称彭觉世于 1725 年 10 月尚患病在崇明县。

续表 5

会籍	国籍	中文名	西文名	原传教地	备注
S. J.	波	台维翰①	Jean-Baptiste Bakowski	江南	1726 年去广州及马尼拉
	意	林安多②	Antoine Xavier Morabito	江南	1726 年后去澳门
	葡	秉多	Manuel Pinto	江南	1728 年去澳门③
	法	卜纳爵④	Ignace-Gabriel Baborier	陕西	1727 年广州逝世
O. P.	西	白多禄⑤	Pedro Sanz	福建	1730 年去广州，1732 年去澳门
	西	黄瑟伯⑥	Eusebio Hoscote	福建	1732 年去澳门

据上表，1725 年 11 月以后驱逐到广州的传教士共有 14 人，其中耶稣会 12 人，多明我会 2 人。两次驱逐到广州的传教士共有 54 人，再加上原本在广州居停的传教士 42 人，则雍正禁教时期前后在广州居停的传教士达 96 人。这应该是广东天主教史上在广州寄居传教士最多的一次记录，这恐怕也是中国传教史上在一个城市寄居传教士最多的一次记录。

---

① 费赖之书作台维翰，荣振华书作白维翰。《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2 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神父的信（1724 年 10 月 16 日）》，第 340—341 页称，波兰神父台维翰可能于 1724 年 10 月初出发去广州，信后又称，台维翰已经到达广州。而据费赖之和荣振华的资料明确称，台维翰 1723 年后“秘返江南，潜伏二年”，直到 1726 年去广州。[捷] 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 45 页载 1725 年 11 月 20 日严嘉乐的信亦称，台维翰仍在松江。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9 号《江苏巡抚张楷查西洋人分别起送安插事（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第 35 页称，白维翰于 1725 年 10 月尚在华亭县。可证，冯秉正信后编者之语有误。

②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2 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神父的信（1724 年 10 月 16 日）》，第 340—341 页称，意大利人林安多神父可能于 1724 年 10 月初出发去广州。但实际未成行，因为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 45 页载 1725 年 11 月 20 日严嘉乐的信称，林安多神父至今仍留在南京。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9 号《江苏巡抚张楷查西洋人分别起送安插事（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第 35 页将林安多作林安吉，并称 1725 年 10 月，林安吉尚在上元县。

③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67 号《广州府详报会审江南案涉案倪维智等人》，第 238 页称秉多是雍正七年九月初九从江南到澳门，而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第 510 页称秉多 1720 年 8 月在松江府，1728 年 2 月 23 日成为澳门圣若瑟新修道院第一任院长。《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2 卷，《冯秉正神父致本会神父的信（1724 年 10 月 16 日）》，第 340—341 页称，秉多神父可能于 1724 年 10 月初出发去广州。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第 45 页载 1725 年 11 月 20 日严嘉乐的信称，秉多仍在松江。还说秉多是为乐师，早已被邀请去北京，但未能成行。故知，1724 年 10 月秉多并未去广州。其去广州的时间应在 1728 年。据荣振华的材料，秉多 1728 年已在澳门，则欧洲档案雍正七年回澳门说可能有误。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9 号《江苏巡抚张楷查西洋人分别起送安插事（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第 35 页载，1725 年 10 月，华亭县有穆玛诺者准备进京效用，疑此穆玛诺即为秉多玛诺。

④ 费赖之书作卜纳爵，荣振华书作卜嘉。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10 号《中国教徒致神父书》，第 36—37 页中保存了陕西汉中及西安两地的教徒于 1726 年给卜嘉的两封信。可知，1725 年时，卜嘉仍在陕西。故将卜嘉赴广州的时间置于 1725 年 11 月以后。

⑤ 郑天祥编译：《流血记》第 7 章，第 62—69 页称，直到次年（1730）二月中旬，方到达广东的省会广州，当时广州驻有教廷传信部代办，立刻交给他教宗委任状，宣布白神父为福建主教。

⑥ 黄瑟伯，1724 年 11 月底抵达广州，又于 1726 年初潜回福安。1730 年时很可能与白多禄主教同往广州，并接任多明我会广州账房。1732 年被驱往澳门。参见 José Mari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2, p. 120.

三、雍正十年前广州天主教教友及教堂的发展

康熙二十九年（1692），由于康熙帝容教令的颁布，中国天主教获得了合法传播的地位，从此，中国天主教进入了发展高峰期。广州，由于是天主教各修会进入中国的门户口岸，因此不论是经过或不经过澳门的欧洲传教士，都需先在广州居停①，然后进入中国内地，故造成这一时期广州天主教特别发达。1704 年，法国耶稣会士洪若翰在伦敦的信称：

> 广州有 7 座教堂，1 座葡萄牙耶稣会士的教堂，它是 7 座教堂中最早建成的教堂；2 座圣方济各会的教堂；1 座奥古斯丁教派神父的教堂和 1 座我们（指法国耶稣会）的教堂。每座教堂有 1—2 名传教士。尽管广州有 7 座教堂，然而在广州皈依的人却很少。②

1704 年之前，广州即有天主教堂 7 座，但当时入教的人还不太多。康熙五十六年（1717），广东碣石总兵陈昴称：

> 天主一教，设自西洋，今各省设堂，招集匪类，此辈居心叵测。目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丛集，安知道不交通生事？乞敕早为禁绝，毋使滋蔓。③

可见，至康熙末年时，广州天主教的发展已令清廷警觉。雍正元年禁教又将各省传教之西洋人送至广州，更推动了广州天主教的发展。时人蓝鼎元称：

> 雍正元年，浙闽总督满保以西洋人行教惑众，大为地方之害。请将各省天主堂改作书院、义学；各省西洋人俱送澳门，俟有便船归国。广东督抚市恩奏诸夷人老病不愿回者，听其在省天主堂居住，不许招致本地男妇行教诵经，违者治罪逐回。④

然而，禁止在广州的传教仅是一纸空文，大量传教士被驱逐到广州，并没有因为清廷的禁教而停止传教，正如龙伯格所言："这些传教士一到广州，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开展传教的工作。"⑤ 而他们的努力传教极大地促进了广东地区天主教的发展。到雍正十年（1732），平民百姓入天主教者急剧增多，"无知愚民入教者不下数万"⑥。广东巡抚鄂弥达雍正十年的一份奏折，更详细地披露了这一批被驱逐到广州的西洋传教士在广东省城大肆发展天主教的情况：

> 该西洋人等理宜感激皇恩，安守本分，不意仍不悛改，招党聚众，日增月盛。臣细加查察，凡住天主堂者，类皆不吝金钱，招人入教，地方无赖多坠术中。其法，有愿从其教者，必使自践其祖宗父母之神主，而焚于所尊十字之下。遂给以银钱十枚，俾以一钱招一人，既得十人从教，乃予先从者月饷五钱，而又予十人以百钱，俟百钱皆有人受而来从，乃月饷十人各五钱，而升初从者月饷一两。由是递升递招，至于月给银十两者，即令司其所招之人。

---

① 至 1699 年时，葡萄牙耶稣会已在第六铺建堂，西班牙方济各会已在杨仁里东约及花塔街建堂 2 座，巴黎外方传教会已在杨仁里南约油纸巷建堂，奥斯定会在天马巷建堂，法国耶稣会在清水濠建堂。1705 年，教廷传信部在小南门内建堂。1716 年，多明我会又在濠畔街买无建堂。天主教各修会及传信部在康熙中后期纷纷在广州建立了自己的传教基地。参见 Joseph Dehergne，La Chine du sud-est：Guangxi et Guangdong：Etude de Géographie Missionnaire,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Vol. XLV*, 1976, pp. 22—25；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上册，第 101 页；José Maria González，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Vol. 2，p. 120.

②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1 卷，《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神父致国王忏悔师、本会可敬的拉雪兹神父的信》，第 330 页。本处的 7 座教堂应为 6 座教堂之误，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广州只有一个教堂，详见下考。

③ 《清圣祖实录》卷 272，康熙五十六年四月戊戌。

④ 蓝鼎元：《鹿州初集》卷 11，《粤彝论》，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本，第 821—824 页。

⑤ ［丹麦］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第 18 页。

⑥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 1 册，第 189 号《江苏巡抚庄有恭奏呈广州府南海番禺等县沙地不便归澳门同知管理折》（乾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276 页。按："入教者不下数万"应为不实之词。当时广州的教民实际为 12000 人左右。

愚民利彼金钱，多从其教。今查得，省城设立教堂，男女多诳惑，男天主堂房八处，共引诱入教男子约万人。又女天主堂房八处，更引诱入教女子约两千余百人。①

这一份档案资料还公布了广州男女教堂的详细情况，根据档案内容，列表如下：

表 6　雍正十年广州男女教堂分布情况表

	教堂所在地	堂主	副堂	同堂	入教人数	所属修会
男堂	西门外杨仁里东约	西洋人安哆呢	西洋人艾色		1400 余人	O. F. M
	杨仁里南约	西洋人戈宁	顺德人刘若德		1000 余人	M. E. P.
	濠畔街	西洋人谢德明		增城人欧歌、山东人魏若韩	1200 余人	O. P
	芦排巷	西洋人方玉章	西洋人朱耶芮		1100 余人	S. J. （葡）
	天马巷	西洋人罗铭恩	顺德人刘依纳爵	顺德人梁家湘	1300 余人	O. F. M.
	清水濠	西洋人彭觉世、卜如善	西洋人张尔仁、赫苍碧	江南人王弘义	2000 余人	S. J（法）
	小南门内	西洋人闵明我	新会人江四	始兴人黄绍兴、张玛略、南海人刘若敬、郝若瑟、欧良佑、何伯衍	1400 余人	P. F.
	花塔街	西洋人华姓	西洋人卞述芳		300 人	O. F. M.
女堂	清水濠	顺德人谭氏、刘氏			400 余人	S. F. （法）
	小南门内	顺德人陈氏			300 余人	P. F.
	东朗头	顺德孀妇梁氏			600 余人	M. E. P.
	盐步	顺德孀妇梁氏			600 余人	S. J. （葡）
	西门外变名圣母堂	顺德孀妇何氏			200 余人	O. F. M.
	大北门外天豪街变名圣母堂	正蓝旗人余氏			300 余人	O. F. M.
	小北门内火药局前	顺德孀妇苏氏			200 余人	O. F. M.
	河南滘口	南海人唐琼章妻戴氏，同堂孀妇卢氏、唐氏			300 余人	O. P.

上表所列教堂分别属于何修会？上述西洋人为谁？试证如下：

男八堂为：

1、西门外杨仁里东约堂

为方济各会之教堂。荣振华公布的 1699 年、1724—1725 年及 1732 年广州教堂资料均称该堂为方济各会堂。② 1678 年方济各会士获尚之信赠银 300 两正式在广州城外的杨仁里购置了一座大宅院，1679 年底正式建成此堂，命名为“圣方济各大教堂”，由于位于广州城外杨仁里，故俗称“杨仁里福音堂”③。杨仁里位于今广州市市政府西南光复南路（原名打铜铺）西侧，属荔湾

①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 1 册，第 124 号《广东巡抚鄂弥达奏闻驱逐广州各堂堂主至澳门将教堂改作公所折》，第 170 页。

② Joseph Dehergne, La Chine du sud-est: Guangxi et Guangdong: Etude de Géographie Missionnaire,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Vol. XLV*, 1976, pp. 22—24.

③ *Sinica Franciscana*, *Vol. IV*, pp. 106—112.

区，隋代称杨仁坊，是广州古老街巷之一。① 安哆呢，西班牙方济各会士，西文名 António de Ia Concepción，1697 至 1749 年在华传教，是一名医生，并担任方济各会中国传教团司库一职。② 艾色，西班牙方济各会士，西文名 Thomas a S. Maria，1724 年来华，为安哆呢的助手③。据上引清档，方济各会杨仁里东约堂入教教民为 1400 余人。

2、杨仁里南约堂

为巴黎外方传教会之会堂。据雍正十一年（1733）《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中国各地买地建堂单》："广东省城南海县太平门外油纸巷，又名杨仁南天主堂，买契不在暹罗。"④ 据这一名单，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广州仅有一座教堂。但据荣振华称康熙三十八年（1699）时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广州有两座教堂，一是杨仁里南约堂，一是油纸巷堂，称雍正十年（1732）亦为杨仁里南约堂和油纸巷堂二堂⑤。据上引《建堂单》即可知，杨仁里南约堂即油纸巷堂，实为一堂，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广州只建有一座教堂，荣振华说有误。杨仁里南约，今称杨仁南，在广州市市政府西南，扬巷路东侧，东接由义巷，因在杨仁里之南而得名，属荔湾区。⑥ 戈宁，当即安东·郭奈，巴黎外方传教士，法文名 Antoine Connain，戈宁当即 Connain 之译音。戈宁于 1729 至 1740 年在中国。1732 年担任巴黎外方传教会驻广州司库，同年被驱逐至澳门，继续担任该会驻澳门司库。⑦ 据上引清档，巴黎外方传教会杨仁里南约堂入教教民达 1000 余人。

3、濠畔街堂

为多明我会教堂。荣振华称 1724 至 1725 年广州有 8 座教堂，其中提及濠畔街堂为多明我会教堂。而 1732 年有两份文献，一份文献称广州诸堂中没有濠畔街堂，另一份文献则称濠畔街堂为多明我会堂。⑧ 多明我会正式在广州建堂应在康熙五十四年，多明我会士郭多禄（Pedro Muñoz）花 800 两白银在广州城内濠畔街买了一所房屋，1716 年 1 月建成教堂，并成为多明我会司库所在地。⑨《广州城坊志》称："广州南城之右，为归德门，背城一带旧为狎邪地，南邻濠水，朱楼画榭，鳞次相接，隔岸为濠畔街。"⑩ 该街位于今广州市政府西南大德路南侧，东连解放南路，西接人民南路，应在明朝广州护城壕之南畔，故名。属越秀区。⑪ 谢德明是西班牙多明我会士，西文名 Manuel Tenorio，1727 年入华，1728 年接替郭多禄担任多明我会驻广州司库。⑫ 据上引清档，多明我会濠畔街堂入教教民达 1200 余人。

4、芦排巷堂

---

① 广州市地名委员会编：《广州市地名志》，香港大道文化有限公司出版，1989 年，第 140 页。

② *Sinica Franciscana*, Vol. Ⅸ, pp. 617—618.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第 182 页，"在澳蕃医有安哆呢，以外科擅名久"。

③ *Sinica Franciscana*, Vol. Ⅸ, p. 622.

④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21 号《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中国各地买地建堂单》（雍正十一年），第 46 页。

⑤ Joseph Dehergne, La Chine du sud-est: Guangxi et Guangdong: Etude de Géographie Missionnaire,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Vol. XLV*, 1976, pp. 22-23.

⑥ 广州市地名委员会编：《广州市地名志》，第 140 页。

⑦ Gérard Moussay et Brigitte Appavou, Repertore des menbers de La Sociéte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1659—2004）, Archives de MissionsÉtragères, Paris, 2004, p. 70.

⑧ Joseph Dehergne, La Chine du sud-est: Guangxi et Guangdong: Etude de Géographie Missionnaire,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Vol. XLV*, 1976, pp. 22-23.

⑨ José Maria González ,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 Vol. 2, p. 120.

⑩ 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 4，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258 页。

⑪ 广州市地名委员会编：《广州市地名志》，第 36 页。

⑫ José Mari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2, pp. 186—187.

为葡籍耶稣会教堂。荣振华称，1632 年，耶稣会教堂在第六铺、芦排巷、清水濠。[①] 清水濠堂为法国耶稣会教堂。第六铺，又称第六甫，在广州城西门外，位于今光复中路北段。[②] 据荣振华的材料，1699 年，广州城外第六甫即有属葡萄牙耶稣会的一所教堂。1724—1725 年的档案又称，第六甫教堂负责人为方玉章，而清档又称，芦排巷教堂堂主为方玉章，故疑芦排巷堂与第六甫堂即为一堂，第六甫为区域名，芦排巷则为街巷名。据光绪《广州府志》芦排巷在龙津桥侧[③]，位于旧龙津东路之南侧，分属荔湾区。[④] 方玉章，又译房日升，葡籍耶稣会士，葡文名 Francesco de Cordes。1716 年来华，先在各地传教，1724 年驱逐至广州，管理佛山教区，1732 年被驱逐至澳门。[⑤] 朱耶芮，荣振华书《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载比利时人 Philippe Cazier 即朱耶芮[⑥]，费赖之书则称“储斐理”[⑦]。荣、费此说可疑处有二，一是此朱耶芮为比利时耶稣会士，高龙鞶神父称其隶属法国耶稣会，不应在葡籍耶稣会堂；二是此朱耶芮于 1722 年 6 月 13 日在广州患麻风病病死，不应该到 1732 年还在芦排巷堂居住。如果荣氏定 Philippe Cazier 为朱耶芮不误，则荣书所载朱耶芮死于 1722 年 6 月 13 日为误，二者必居其一。据上引清档，葡萄牙耶稣会芦排巷堂入教教民达 1100 余人。

5、天马巷堂

1707 年文献记录的广州教堂即有天马巷堂。1699 年文献称天马巷堂属奥斯定会。1724—1725 年文献称天马巷堂属奥斯定会。1732 年文献亦称天马巷堂属奥斯定会。[⑧] 但清档中天马巷堂堂主为罗铭恩，罗铭恩是西班牙方济各会士，又译作罗安宁，西文名 Miguel Roca，1696 年来华，1709 年在北京领票，1712 年在福建传教，1715 年与 1724 年两次担任方济各中国传教会会长。[⑨] 为什么一座奥斯定会的教堂由方济各会士来当堂主呢？其中的原因应是，1710 年后，由于奥斯定会来华传教士们全部拒绝领取“印票”，他们必须放弃在江西及广东地区的传教事业而离开中国，故他们原来所建教堂亦交由其他修会管理。[⑩] 广州天马巷堂原本为奥斯定会教堂，奥斯定会撤离后，该堂当即交由方济各会士罗铭恩管理。令人费解的是荣振华知道罗铭恩是方济各会士，为什么还将 1724 年和 1732 年的天马巷堂称为奥斯定会的教堂？[⑪] 天马巷，《广州城坊志》称“文明门外天马巷”[⑫]。据光绪《广州府志》，文明门为大南门东面的一座城门。[⑬] 今天马巷在

---

① Joseph Dehergne, La Chine du sud-est: Guangxi et Guangdong: Etude de Géographie Missionnaire,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Vol. XLV*, 1976, pp. 22—23.

② 广州市地名委员会编：《广州市地名志》，第 129 页。

③ 史澄：《（光绪）广州府志》卷 8，《省城图》，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光绪五年刊本，第 134 页。

④ 广州市地名委员会编：《广州市地名志》，第 129 页。又据方豪藏本《辩学》之《各处堂志》称，广州堂“在西门外太平桥”。太平桥在人民南路西侧至光复南路，明清时，该桥位于太平门外，此堂亦为葡萄牙耶稣会堂。1646 年，由耶稣会士毕方济所建，与第六甫芦排巷堂非同一堂，很可能此堂在杨光先教难时被毁。

⑤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 652 页。

⑥ ［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册，第 123 页。

⑦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 636 页。

⑧ Joseph Dehergne, La Chine du sud-est: Guangxi et Guangdong: Etude de Géographie Missionnaire,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Vol. XLV*, 1976, pp. 22—23.

⑨ *Sinica Franciscana*, *Vol.* Ⅹ, pp. 242—244, p. 731, pp. 779—780；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第 277 页。

⑩ *Sinica Franciscana*, *Vol.* Ⅸ, pp. 413—414.

⑪ Joseph Dehergne, La Chine du sud-est: Guangxi et Guangdong: Etude de Géographie Missionnaire,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Vol. XLV*, 1976, pp. 22—23. 其引 1732 年之广州教堂名单之中文档案，仅称“天马巷”，并没有标明属奥斯定会，可知，应是荣振华之误。

⑫ 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 4，第 250 页。

⑬ 史澄：《（光绪）广州府志》卷 8，《省城图》，第 134 页。

万福路西段北侧内街，北至仰忠街，南至东横街，相传明代巷内大户有一对白马，被誉为天马，故名。① 据上引清档，方济各会天马巷堂入教教民达1300余人。

6、清水濠堂

法国耶稣会士教堂。1699年中文手稿广州教堂中有“清水濠”堂，称属于法国耶稣会。1707年的手稿亦有“清水濠”堂，至1732年的资料均有清水濠堂，属法国耶稣会。② 该堂应该是1692年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神父至广州时购置，教堂正式建成可能在1701年，由卫嘉禄（Charles de Belleville）神父设计。③ 据1725年11月15日胡若望致傅圣泽的信称：“目前又会清水濠堂戈老爷驾临慰言。”此清水濠堂即法国耶稣会教堂，此戈老爷，即法国耶稣会账房戈维里（Pierre de Goville）。④ 清水濠，又称东濠，位于广州城东，由朱亮祖于明洪武三年（1370）开浚。⑤ 清水濠位于今文德路与越秀南路之间，其间又与德政中路南端相交，属东山区。⑥ 彭觉世，又译作彭加德，觉世为其字，法国耶稣会士，法文名 Claude Jacquemin。卜如善，又译作卜日生，字若望，法国耶稣会士。法文名 Jean Baborier⑦。又1696年任云南代牧主教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 Philibert Le Blanc，其中文名亦为卜于善⑧。张尔仁，又译作张貌理，法国耶稣会士，法文名 Maurice de Baudory。张尔仁死于1732年8月15日，也就是在遣送诸神父去澳门时，他因重病，故未去澳门，死后葬于广州东门外一佛寺中⑨。赫苍壁，法国耶稣会士，法文名 Julien-PlacideHerieu，雍正禁教时被逐回广州。⑩ 据上引清档，法国耶稣会清水濠堂入教教民达2000余人。

7、小南门内堂

为教廷传信部教堂。1707年广州教堂资料中即有“小南门内县前”教堂，1724—1725年的资料则已注明“小南门德政街，教廷传信部”，1732年的资料亦载，教廷传信部在“小南门”，并列“毕天祥、闵明我”二人。⑪ 教廷传信部资料称此堂是1705年教宗特使铎罗购置。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称：“（1786年）3月30日，（巴黎外方）传教会总务长若奥·巴蒂斯达·马什尼（João Baptista Marchini）神父自广州来至澳门，将铎罗宗主教于1705年8月16日建于广州的总务处迁至澳门。”⑫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称铎罗宗主教到广州以后，决定在广州设立一传信部在华办事处，并任命意大利神父伊纳西奥·贡佩（Inácio Giampé）为第一任办事处主任。⑬ 办事处即设在小南门内教堂，教堂建成应在1705年。小南门德政街，即今德政

---

① 广州市地名委员会编：《广州市地名志》，第100页。

② Joseph Dehergne, La Chine du sud-est: Guangxi et Guangdong: Etude de Géographie Missionnaire,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Vol. XLV*, 1976, pp. 22—23.

③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429页，第545页。又据《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1卷，《洪若涵神父致拉雪兹神父信》，第330页称：广州（1704年）有7座教堂，其中一座为法国耶稣会教堂。

④ ［美］史景迁（Jonathen D. Spence）著，黄秀吟、林芳梧译：《胡若望的疑问》，第106页。

⑤ 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6，第344页。

⑥ 广州市地名委员会编：《广州市地名志》，第98页。

⑦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606页，第639页。

⑧ Claudia Von Collani, *Artus de Lionne, M. E. P., et La Chine*, Actes du VII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de Chantilly, Ricci Institute, Taipei, 1995, pp. 47—48.

⑨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641—642页。

⑩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589—590页。

⑪ Joseph Dehergne, La Chine du sud-est: Guangxi et Guangdong: Etude de Géographie Missionnaire,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Vol. XLV*, 1976, pp. 22—24.

⑫ ［葡］施白蒂著，小雨译：《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澳门基金会，1995年，第186页。

⑬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上册，第101页。

中路段，南起万福路，北至中山四路，因该街北端有清番禺县衙门，故名番禺直街，后改为德政街，在广州城小南门内，故名，属东山区。① 清档称“小南门内堂”堂主为闵明我。闵明我，为教廷传信部意大利传教士，意大利文名 Arcangelo Miralta，1719 年随教宗特使嘉乐（Carlo Mezzabarba）来华，后在江西、浙江、江苏等地传教，1724 年被驱逐至广州，随即担任传信部账房，1732 年又驱逐至澳门，又在澳门担任传信部账房。② 清档又译作闵爱干束③，以示与多明我会之闵明我、耶稣会之闵明我区分。据上引清档，教廷传信部小南门内德正街堂入教教民达 1400 余人。

8、花塔街堂

为西班牙方济各会堂。1699 年广州教堂数据中亦有“花塔街”堂，并列“方济会华姓”之名④；1732 年广州教堂资料中称方济会西班牙籍会士之教堂在花塔街，并列“华姓”及“卞述芳”之名。花塔街堂应是西班牙方济各会在广州建立的第一座教堂。方济各会士于 1674 年“就在王爷（尚之信）府邸附近选择了一个恰当的地点，开始建立建堂”⑤。这实际上是一座专为男信徒建立的小教堂，位于尚之信宅邸附近他送方济各会教士的一座小院内，教士们将其命名为“天使圣母堂”⑥，因其地在花塔街，故文献中多称之为“花塔街堂”。1680 年，方济各会士卞芳世的《进教领洗捷录》及利安定《永福天衢》均在广州朝天路教堂出版⑦，而卞芳世则是花塔街教堂的创建人，故疑花塔街教堂又称为“朝天路教堂”。花塔街，即今六榕路，北连百灵路，南接中山六路，属越秀区。⑧《省城图》标花塔街在将军府之东，稍南即朝天街，两处间距甚迩，故将“花塔街堂”称为“朝天街堂”亦不为奇。⑨ 清档称花塔街堂为“华姓”，副堂为“卞述芳”。华姓，当即西班牙方济各会会士华夏宁，西文名 Diego de Santa Rosa，1696 年来华，先在福建、江西传教，后被驱逐至广州，1708 年担任方济各会中国传教会会长。华夏宁的中文名又作“花迪我”。⑩ 卞述芳，西班牙方济各会士，西文名 Miguel Torrejón，1721 年来华并抵达广州，一直在广州地区传教。⑪ 据上引清档，方济各会花塔街堂入教教民仅达 300 人。

女八堂为：

1、清水濠女堂。前证清水濠堂为法国耶稣会所建的教堂，则此女堂亦当为法国耶稣会所建之堂，亦当位于文德路与越秀南路之间。

2、小南门内女堂。前证小南门内德政街堂为教廷传信部所建之堂，则此女堂亦当为教廷传信部所建之堂，位于小南门内德政街。

---

① 广州市地名委员会编：《广州市地名志》，第 76 页。

② *Sinica Franciscana*, Vol. *X*, p. 373；［美］孟德卫：《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1785》，第 156 页。

③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 1 册，《福建巡抚周学健奏报拿获天主教夷人并办理缘由折》，第 78 页。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34 号《福建漳州府漳浦县元本濂邵武府建宁县王文昭会审福安天主教案招册》，第 130—140 页，及第 39 号《福安遭难事实》，第 149 页。

④ Joseph Dehergne, La Chine du sud-est: Guangxi et Guangdong: Etude de Géographie Missionnaire,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Vol. XLV*, 1976, pp. 22—24.

⑤ Lorenzo Pérez, *Origen de las Misiones Franciscanas en la Provincia de Kwang-Tung* (*China*), *en Archivo Ibero-Americano*, No. ⅩⅨ, em Enero-Feberero de 1917, Madrid, 1918, p. 234—235.

⑥ 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第 190 页。

⑦ Pascale Girard, *Os Religious Ocidentais na China Moderna* , Edição da Comissão Territorial de Macau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 Fundação Macau e Instituto Politécnico de Macau, 1999, pp. 494—501.

⑧ 广州市地名委员会编：《广州市地名志》，第 14 页。

⑨ 史澄：《（光绪）广州府志》卷 8，《省城图》，第 134 页。

⑩ 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第 277 页及第 363 页。

⑪ *Sinica Franciscana*, *Vol.* Ⅹ, p. 485.

3、东朗头女堂。东朗，又作东塱，在珠江西岸，今广州造船厂之南，属芳村区东滘镇。该堂与杨仁里南约堂相距最近，很可能为巴黎外方传教会所建之女堂。

4、盐步女堂。盐步，又称盐步堡，“在省城西南，距省城二十五里”①，位于今佛山市南海区盐步大道一带。该堂与第六甫芦排巷男堂相距最近，很可能亦为葡萄牙耶稣会士所建之女堂。据清档，盐步女堂与东朗头女堂均归“顺德孀妇梁氏”一人管理，故知两堂相距亦不远。

5、西门外变名圣母堂。据方济各会档案，1674 年，方济各会在花塔街建起第一座圣堂后，“传教士们又开始寻找合适的地方，准备专门为女信徒们建一间圣堂，不久，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将他一座宽敞的住宅奉献出来，传教士们为女教友们建立了一间舒适典雅的圣堂，并称之为‘圣母堂’”②。故知，这一圣母堂当即方济各会花塔街圣堂之女堂，因花塔街在西门内，而“变名圣母堂”在西门外，当在今光复北路一带。

6、大北门外天豪街变名圣母堂。天豪街，当即天濠街，今作添濠街，位于今广州市添濠北街之南，其地在清代应在大北门内③，疑此处“大北门外”当为“大北门内”之误。据方济各会档案称，方济各会传教士们“后来又在另一个街区发展了一百多个信徒，还到一里格远的地方为五十多人洗礼，女人们在另一些女人的感召下，也在她们街区最宽大的住宅里建起了圣堂”④。此堂之名与“西门外变名圣母堂”同，同属方济各会，则知该堂应即杨仁里东约堂之女堂。

7、大北门内火药局前女堂。据《省城图》，火药局标在大北门与小北门之中间，在菊坡精舍之东侧⑤，具体方位应在今广州市广州美术馆一带。笔者疑此堂为西班牙方济各会所建之女堂。

8、河南滘口女堂。滘口，即广州珠江南面之出口处，位于今珠江大桥西桥之西侧，属石围塘街。⑥ 荣振华称，多明我会于 1720 年代在广州城河南设有女堂⑦，疑河南滘口之堂即多明我会濠畔街之女堂。

清廷这次清查广州的教堂，仅仅是城内和城郊之教堂，广州周边属县的教堂并没有提及，比如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广州府增城县、顺德县即有天主堂各 1 座⑧；方济各会在顺德县则有 2 座大圣堂、5 座小圣堂，在东莞也建有 1 座教堂⑨。这些教堂很可能在雍正七年焦祈年整肃广东风俗运动中已被清除。

四、雍正十年将居留广州西教士驱逐至澳门

天主教在广州的发展势头，引起了广东官员的极大不安。时人蓝鼎元称：

---

① 张凤喈：《（宣统）南海县志》，卷 3《舆地略》2，中国地方志集成本，第 127 页。

② Lorenzo Pérez，*Origen de las Misiones Franciscanas en la Provincia de Kwang-Tung*（*China*），*en Archivo Ibero-Americano*，No. ⅩⅨ，p. 234.

③ 史澄：《（光绪）广州府志》，卷 8《省城图》，第 134 页。

④ Lorenzo Pérez，*Origen de las Misiones Franciscanas en la Provincia de Kwang-Tung*（*China*），*en Archivo Ibero-Americano*，*Vol.* ⅩⅨ，pp. 234—235.

⑤ 史澄：《（光绪）广州府志》，卷 8《省城图》，第 134 页。

⑥ 广州市地名委员会编：《广州市地名志》，第 273 页。

⑦ Joseph Dehergne，La Chine du sud-est：Guangxi et Guangdong：Etude de Géographie Missionnaire，*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Vol. XLV*，1976，pp. 20—25.

⑧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 21 号《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中国各地买地建堂单》（雍正十一年），第 46 页。

⑨ 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第 198 页及第 203 页。

今省城天主堂八处，招集一万余人矣。又有女天主堂八处，招集二千余人矣。羞辱中国，伤风败化，凡有人心，罔不切齿。此岂待教而诛之乎？万里经商，本为求财，无故而侵数百千万之银钱，买人归附，此其意欲何为哉？今日万人，明日万人，不胥全省而买遍不止，岂尚可掩耳闭目，阳为不知而不问？先民有言，防微杜渐，涓涓不息，将为江河，而况狂澜四溢，人心荡漾。在省郡者，既实繁有徒，在澳门者，又居然天险，内外交通，铳炮非常，脱有前此吕宋、噶啰吧之谋，不知何以待之。今圣德方盛，威灵暨讫于遐荒，自万万无所容其痴想，然曲突徙薪，亦有心者所宜熟筹也。①

广东巡抚鄂弥达更称：

（臣）目击情形，令人骇异，男堂奔走若狂，女堂秽污难述，倘仍因循推迟，恐为人心风俗之忧。……臣等身任封疆，不得不防微杜渐，现在密加料理，不露行迹，大约一月之内，邪党悉行驱逐矣。②

西文档案也记录了鄂弥达等人的告示，其内容有所不同：

数年之前，满总督发现他们以其邪教诱惑福建民众，于是便上奏皇帝陛下，必须将他们全部从大清帝国驱逐出去，将他们遣返至澳门，以便他们再从那里返归其国。但皇帝陛下出于巨大的宽容，只满足于将他们流放于本国广州城，允许他们在那里居住，一种如此之大的恩惠，值得他们出于感激之情而在行使教务时应有所收敛，但发现他们却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未做任何改善地继续其习以为常的做法：他们用自己的金钱来收买民心，并促使民众接受其教法而皈化；在他们的节日期间，男女基督徒就如同十分落魄一般地奔向其聚会处，社会底层之平民出于愚昧无知或者是受到希望获得的金钱的优惠，故厚颜无耻地跪在了神父们面前；同样也受到了引诱的女子们，则于家宅中聚会。在这样多的人群中，该会犯下多少罪行啊，勾引和堕落只会与日俱增，我们的习惯法横遭破坏，我们的风俗已遭堕落，淳朴天真的行为已经绝迹，人们是否认为如此之大的混乱，仍会使人既不感到痛断肝肠，又不会令人义愤填膺呢?③

另一方面，大批传教士被驱逐到广州后，并没有在广州居住下来，而是不断地有人又秘密潜回原传教点展开传教：

雍正二年，我皇上特颁上谕，垂念外国之人，准其居住广州省城，但不许行教生事，又恐搬移之际，或被地方之人扰累，给予半年数月之限，令沿途委官照看，矜恤远人之恩至优至渥，乃越今五载，外省州县中，竟尚有西洋人潜住，与本地无赖之徒私相往来。④

如法国耶稣会士胥孟德、顾铎泽等，雍正禁教后均被驱逐至广州，后又潜回湖北，并开辟磨盘山传教区⑤；西班牙多明我会士罗巴拉斯和黄瑟伯 1724 年被驱逐到广州，1726 年又潜回福安。已驱逐到广州的传教士又潜回原地传教，这对清王朝的内地禁教造成了极大的干扰。

---

① 蓝鼎元：《鹿州初集》卷 11，《粤彝论》，第 821—824 页。

②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 1 册，第 124 号《广东巡抚鄂弥达奏闻驱逐广州各堂堂主至澳门将教堂改作公所折》，第 171 页。

③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 4 卷，《卜文气神父致戈维里神父的信（1732 年 12 月 11 日）》，第 79—80 页。值得注意的是，大象出版社于 2005 年出版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将这封信的时间标为“1752 年 12 月 11 日”，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同一书中，竟有 5 封书信均标错年代：第 75 封信本应为 1731 年，却标为 1751 年；第 76 封信，本应为 1732 年，却标为 1752 年；第 77 封信，本应为 1733 年，却标为 1755 年；第 79 封信，本应为 1734 年，却标为 1754 年；第 80 封信，本应为 1735 年，却标为 1755 年。

④ 允禄、鄂尔泰等编：《雍正朱批谕旨》，第 7 册《费金吾奏折》，雍正七年十月二日，第 49 页。

⑤ 康志杰：《上主的葡萄园——鄂西北磨盘山天主教小区研究（1636—2005）》，辅仁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9—40 页。

广东自雍正七年底开始，就设立“观风整俗使”一职，其职责为“化导训饬，令风俗人心，渐归醇厚”①，实际上就是要将广东省日渐弥漫的天主教传教予以严禁。雍正八年，广东观风整俗使焦祈年过顺德，“恶其教乱民，引福建例，凡有天主堂，严示驱逐，其屋拆毁”②。所谓“引福建例”，即是指雍正七年（1729）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刘师恕为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抵达福安后，就颁布了禁止民间私习天主教的禁令③。而广东观风整俗使焦祈年也在顺德进行了一场整饬天主教的运动。顺德是当时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总铎区。据方济各会档案记载，顺德县有2座教堂和会院，顺德县周围的45个村庄中还有5座圣堂及20余个会口，每个村庄都有许多教徒④。1724年，北京及全国各地传教士被驱赶到广州时，由于广州的教堂、会院数量有限，难以容纳众多的传教士，于是，顺德教堂就成了安置传教士的最好地方，故当时的顺德是广东天主教最发达的地区。雍正八年焦祈年在顺德发动的这次禁教后，顺德教民纷纷逃离，从上引鄂弥达奏折内容看，这一批顺德教民大多逃至广州，这也是导致广州教民急剧增加的原因。焦祈年巡视广东沿海回广州后，发现广州天主教发展的情况更为严重，遂联合两广总督鄂弥达、广东巡抚杨永斌发起一场驱逐广州传教士的禁教运动，“西洋人置天主堂，使徒归澳门”⑤。“该督抚将居住广州府之西洋人悉行驱逐前往澳门，不容一人在省，以至西洋人流离失所”⑥。《圣教史略》对这一次驱逐澳门事件有较详记载：

> 至前往广州居住之西士，虽不能自由传教，颇能平安度日，满望事有转机，皇上开恩，得早回原处传教。不料，雍正十年秋，复下逐客令，限三日内悉数出境，赴澳门寄存，不准逗留内地。总督大张示谕，张贴四门，污圣教为邪教，凌辱之言，不堪入耳。神父无奈，仓猝出城。圣堂修院，都被抄掠，尤可悲者，教友亦多被锁拏拷挞之后，或充发远方，或收监禁押。⑦

这一次驱逐活动，始于雍正十年六月二十七日（1732年7月22日），最先驱逐的传教士也仅仅是以安哆呢⑧为首的14人，至八月十八日，有两名知县“从每座教堂请来一至两名传教士，并向他们宣布该省的文武百官希望我们全部撤退到澳门”。当时，法国耶稣会会长赫苍碧神父与教廷传信部账房闵明我神父、西班牙方济各会会长罗铭恩神父对广东政府驱逐事件提出抗议，称他们是根据皇帝的诏令而居住广州的，并希望负责驱逐的知县将此事报告皇帝。接着，每座教堂都有1名传教士前往总督府和其他高级官吏的衙门中去告状，但他们在那里都受到了很不友好的接待，葡萄牙耶稣会的方玉章神父则去恳求与他关系密切的广州将军柏之蕃及广州城守副将毛克

---

① 《清世宗实录》卷89，雍正七年十二月。

② 郭汝诚：《（咸丰）顺德县志》卷32，《杂志》，第11页。

③ 徐景熙：《（乾隆）福州府志》卷30，《职官》，上海书店影印乾隆十九年刊本，2000年，第3页；José Marí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Vol. 2, pp. 217—218.

④ 李少峰：《方济会在华传教史》，载罗光主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第79页；*Sinica Franciscana*, Vol. Ⅳ, p. 116.

⑤ 赵尔巽：《清史稿》卷291，《焦祈年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10259页。

⑥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第126号《寄谕广东总督鄂弥达等着查明澳门可否停泊大船以定可否留西洋人在省城居住事宜》（雍正十年八月二十八日），第173页。

⑦ 萧若瑟：《圣教史略》卷14《近世纪》6，第202页。

⑧ 安哆呢，为西班牙方济各会在中国最著名的传教士，亦是一名非常有名的医生，他从1697年进入中国抵达广州直到1749年9月于澳门病逝，前后在华传教达52年之久。其间，一直居住在广州杨仁里东约天主教堂，他给很多广东的官员，包括两广总督杨琳、广东巡抚年希尧、广东巡抚杨文乾、广东巡抚傅泰均治过病，且成为他们的好朋友，他在广州的声望极高，故当时通告驱逐14名外国传教士中，安哆呢名字排在首位，并指控他在广州以治病为名而聚众传播邪教，诱惑男女入教等罪名。参见《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4卷，《卜文气神父致戈维里神父的信（1732年12月11日）》，第80页、第83页；*Sinica Franciscana*, Vol. XI, pp. 617—624.

明，但由于他们两人都是武官，这一类事情他们无权干涉，所以他们用一种客气的方式给予了拒绝。经过多次徒劳无益的四处奔波告状之后，教士们只好放弃了居留广州的希望，但他们希望这一次放逐仅仅限制在第一道告示中提到的以安哆呢为首的14 人。然而，在正式执行驱逐任务的时候，却牵涉到居留广州的30 名传教士，即如卜文气神父的信所称："这样一来，30 名从此之后留在广州的传教士的命运依然如故。"① 正如雍正十年七月十三日（1732 年9 月1 日）毛克明的奏折所称：

查广东省会新旧两城关厢内外，共有天主堂八处，据系西洋人方玉章等三十名居住……。今方玉章等遵如七月初二日自省移赴澳门。②

七月初二即8 月21 日。西文资料亦称：

1732 年（雍正十年）8 月18 日圣旨：8 月21 日，广州的流放者们又被驱逐到了澳门③。

据1732 年卜文气的信：

在8 月20 日的傍晚，根据官吏们的命令，我们全体传教士乘14 或15 艘小船出发。翌日，即8 月21 日……我们扬帆起航，并于23—24 日夜抵达澳门。由于那里有耶稣会士的2 座住院和3 座各修会的修道院，所以我们没有费多大周折，便在那里找到了住所，我们受到了非常盛情的接待。④

但是，各种记录关于从广州驱逐到澳门的传教士人数不同。施白蒂《澳门编年史》：

1732 年8 月20 日，由于中国雍正皇帝的旨令，遭到驱逐的传教士从广州分乘6 艘船于21 日启航前来澳门，于24 日抵达。根据若泽·德·热苏斯·马里亚修士的记载，其有约40 位传教士。⑤

又据《传教年鉴》第20 卷：

通谕发出后就有35 名传教士被地方当局逮捕，其中4 名主教是在广州被捕的。1732 年，被捕教士被押送澳门。⑥

而韩承良方济各会的材料则称：

虽然被驱逐出境的传教士们，透过北京耶稣会士的关系，可以住在广州，并在那里维持教友们的宗教生活。但是到了1732 年，连广州也自身难保了。是年8 月18 日，一切客居广州的传教士，都必须立即撤离广州，被逐到澳门去。当时在广州避难的有36 位传教士，他们都被迫上船押走了。在这36 位传教士中有9 位西班牙会士，一位意大利会士。⑦

而据荣振华的资料：

据发表于313（《汉学研究室情报》）/397 的论文记载，恰恰有30 名会士被从广州驱逐到了澳门，即其中包括有3 名西班牙多明我会士、8 名西班牙方济各会士、3 名葡萄牙耶稣会士、3 名意大利教廷传信部会士、10 名法国耶稣会士。⑧

身在被流放之列的马若瑟神父，1733 年10 月5 日的信称：

---

①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4 卷，《卜文气神父致戈维里神父的信（1732 年12 月11 日）》，第76—82 页。

②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 册，第125 号《广州城守副将毛克明奏报西洋人方玉章设教惑众逐往澳门情由折》，第172 页。

③ ［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第821 页。

④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4 卷，《卜文气神父致戈维里神父的信（1732 年12 月11 日）》，第83—84 页。

⑤ ［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 世纪》，第118 页。

⑥ 转引自［法］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25 页。

⑦ 韩承良：《中国天主教传教历史：根据方济会传教历史文件》，第61 页。

⑧ ［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第852 页。

同时，他（指雍正）也决定在中国境内消除基督教的影响，驱逐了至1724年以来一直流放在广州的30位传教士。①

中文档案称：

查广东省新旧两城关厢内外，共有天主堂八处，俱系西洋人方玉章等三十名居住。……今方玉章等遵于七月初二日自省移赴澳门讫。②

中文档案记录驱逐到澳门传教士人数亦为30人③，与荣振华及马若瑟记录数相合，毛克明和马若瑟均是这一次驱逐行动的当事人，故大致可以认定当时从广州驱往澳门的西洋传教士应是30人。这30人为谁，各种文献俱无清晰记录。荣振华只公布了其中27人的所属会籍，而并无姓名，我们根据各种资料对驱逐到澳门的30各传教士作如下判断：

西班牙多明我会士3人：白多禄、黄瑟伯、谢德明；

西班牙方济各会士8人：安哆呢、艾色、巴廉仁、卞述济、罗铭恩、花迪我（华夏宁）、桑托斯、卞述芳；

葡萄牙籍耶稣会士3人：房日升、骆保禄、索玛诺；

法国耶稣会士10人：卜文气、孟正气、郭中传、赫苍碧、德玛诺、彭加德、聂若翰、马若瑟、张貌理、朱耶芮；

教廷传信部3人：毕天祥、闵明我、麦传世；

巴黎外方传教会3人：戈宁、计有纲、艾神父；

以上30人，荣振华漏记巴黎外方传教会3人④，这应该就是雍正十年七月初二由广州驱逐到澳门的30名传教士的全部名单。这一次驱逐行动，受迫害最大者应该是广州的基督徒。最开始有50名广州基督徒作为陪同传教士的仆人一起登船被驱往澳门，但到香山界内，又奉上级命令将50名基督徒重新解押回广州，并押上不同的法庭进行了刑讯，还在城内将部分基督徒游街示众。此后，又从8座教堂中抓捕的基督徒中将为首的12人施以笞刑，有的则被判处带枷一两个月，有8名或者10名基督徒被流放到海南岛，其他的奉教者皆被遣还故里。⑤

传教士被驱逐到澳门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以戴进贤为主的留京传教士再次上疏陈情为神父们伸冤：

西士无辜被逐，情殊可悯，求恩准回内地，如前传教。⑥

雍正皇帝览奏后，传旨召在京西士面见，并“盛气厉色”谕之曰：

汝辈西洋人，何裨于我中国，彼寄居广东者，被逐出境，乃礼之当然，又何辞之有？即汝辈在京当差，亦岂能久焉？⑦

可知，雍正驱广州传教士至澳门，其意已决，在京西教士亦无可奈何。且“心怀惴惴，常恐有

---

① ［丹麦］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第77—78页。

②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第125号《广州城守副将毛克明奏报西洋人方玉章设教惑众逐往澳门情由折》，第172页。

③ 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7，第204页，“雍正十年秋，又下逐客令，限三日内，悉数出境，赴澳门寄存，或返西洋，不准逗留内地”。返西洋者，径从广州出海，所谓三十五人或三十六人者，当时包括部分从海上出境而未入澳门者。

④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4卷，《卜文气神父致戈维里神父的信（1732年12月11日）》，第82页称，巴黎神学院的三名法国教士对于去澳门的居留感到畏惧，于是便要求允许他们乘坐到达中国的船只撤走，但未获同意。查1732年在广州或中国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只有两人，一是戈宁，一是计有纲。当时在广州第三位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就只可能是艾神父了。参见前表3。

⑤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4卷，《卜文气神父致戈维里神父的信（1732年12月11日）》，第84—89页。

⑥ 萧若瑟：《圣教史略》卷14，《近世纪》6，第202页。

⑦ 萧若瑟：《圣教史略》卷14，《近世纪》6，第202—203页。

不测之祸”①。

雍正十年（1732）的广州禁教，不仅仅是将居住广州的传教士驱逐澳门，而且对教友及传教场所进行了大规模的迫害和破坏。雍正十年的广州大教难后，不仅广东地区天主教再一次进入低潮，而且全国的天主教形势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广州作为从澳门到内地传教之中转站的作用从此丧失，传教士从澳门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均须采用秘密的偷渡方式潜入中国。

主要参考文献

[1] 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

[2]［丹麦］龙伯格著，李真、骆洁译：《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年。

[3]［法］杜赫德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 年。

[4]［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

[5]［法］费赖之著，梅乘骐、梅乘骏译：《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6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 年。

[6]［法］方立中著，耿升译：《1697—1935 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7]［法］荣振华著，耿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

[8] 广州市地名委员会编：《广州市地名志》，香港：香港大道文化有限公司出版，1989 年.

[9] 高智瑜、马爱德主编：《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栅栏》，澳门文化局，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所，2001 年。

[10] 韩承良：《中国天主教传教历史：根据方济会传教历史文件》，台北：台北思高圣经学会出版社，1994 年。

[11] 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标点本，2012 年。

[12] 鞠德源：《清宫画家郎世宁年谱——兼在华耶稣会士史事稽年》，《故宫博物馆院刊》，1988 年第 2 期。

[13]［捷］严嘉乐著，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1716—1735）》，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 年。

[14] 康志杰：《上主的葡萄园——鄂西北磨盘山天主教小区研究（1636—2005）》，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6 年。

[15]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台北：光启出版社，1961 年。

[16] 罗光主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台南：征祥出版社，1967 年。

[17]［美］孟德卫著，潘琳译：《灵与肉：山东的天主教，1650—1785》，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年。

[18]［美］史景迁著，黄秀吟、林芳梧译：《胡若望的疑问》，台北：唐山出版社，1996 年。

[19]［葡］施白蒂著，小雨译：《澳门编年史：16—18 世纪》，澳门基金会，1995 年。

[20]《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年。

[21]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 年。

[22] 允禄、鄂尔泰等编：《雍正朱批谕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

[23] 蓝鼎元：《鹿州初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本。

[24]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赵春晨校注本，澳门文化司署，1992 年。

[25] 郭汝诚：《（咸丰）顺德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咸丰三年刊本。

[26] 徐景熙：《（乾隆）福州府志》，上海：上海书店影印乾隆十九年刊本，2000 年。

[27] 史澄：《（光绪）广州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光绪五年刊本。

[28] 张凤喈：《（宣统）南海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宣统三年刊本。

[29] 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30] 萧若瑟：《圣教史略》，河北献县天主堂版，1932 年。

[31] 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 年。

[32]［意］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3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暨南大学古籍所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

---

① 萧若瑟：《圣教史略》卷 14，《近世纪》6，第 204 页。

［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
［35］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年。
［36］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台北：光启出版社，1992 年。
［37］郑天祥编译：《流血记》，澳门：澳门慈幼印书馆，1950 年。
［38］Adrien Launay, *Histoire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u Se-Tchoan*, Vol. 1, Paris: Téqui, 1920.
［39］Claudia Von Collani, *Artus de Lionne*, *M. E. P.* , *et La Chine*, Actes du VII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de Chantilly, Ricci Institute, Taipei, 1995.
［40］Gérard Moussay et Brigitte Appavou, Répertoire des Membres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1659—2004), Archives de MissionsÉtragères, Paris, 2004.
［41］Joseph Dehergne, La Chine du sud-est: Guangxi et Guangdong: Etude de Géographie Missionnaire,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Vol. XLV*, 1976.
［42］José Maria Go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Ediciones Studium, 1955.
［43］Lorenzo Pérez, *Origen de las Misiones Franciscanas en la Provincia de Kwang-Tung* (*China*), *en Archivo Ibero-Americano*, No. ⅩⅨ, em Enero-Feberero de 1917, Madrid, 1918.
［44］Noël Gubbels, Trois Siècles d'Apostolat——Histoire du Catholicisme au Hu-Kwang depuis les origines 1587 jusqu'à 1870, Franciscan Press, 1934.
［45］Pascale Girard, Os Religious Ocidentais na China Moderna, Edição da Comissão Territorial de Macau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 Fundação Macau e Instituto Politécnico de Macau, 1999.
［46］*Sinica Franciscana*, Vol. Ⅹ, Apud Collegium S. Bonaventurae, Rome, Madrid, 1997.

Research on Expulsion of Missionaries to Guangzhou during the Yongzheng Period

Tang Kaijian (University of Macau, Av. Padre Tomás Pereira, Taipa, Macau, China Department of History, FSS, PG15; kjtang@umac.mo)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Catholic mission in Guangzhou after the issue of the prohibition decree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Yongzheng reign. It analyzes the flow and distribution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all around China who were first expelled to Guangzhou and then to Macau. It includes intensiv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origin and heads of 8 male and female Catholic churches as well as their religious orders. The findings of this article will greatly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atholic mission in China after the issue of Prohibition decree of Yongzheng emperor.